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司书岩等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党的作风建设智慧
王智源等 略论合肥出海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黄春英 关于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思考
张 梅 通州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2025年第4期（总第114期）
第24卷 双月刊 7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马 俊

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理论视野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党的作风建设智慧.....司书岩 王玉堂(3)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仇丽萍(10)

策论园地

略论合肥出海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王智源 马科伟 王勇 刘安黎(15)

关于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思考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黄春英(18)

通州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张梅(23)

论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周鑫 薛勇(28)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230031
(0551)62206658;62206629
xb1233@126.com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学思札记

十月革命后列宁农民主体性思想的三维探析 梁玉锦(35)

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构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魏志达(42)

信息荟萃

“科技创新与网络文明同频共振”等七则.....(53)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党的作风建设智慧

司书岩 王玉堂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形态,更是一座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富矿,蕴含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求真务实、以上率下、正心修身等重要思想元素和观念、主张,是进行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定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筑牢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文化根基,不断消除不正之风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推动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持续好起来。这不仅是推动党的作风建设返璞归真、固本培元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1][480]}中国古称华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形态,更是一座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富矿,蕴含着“中国人

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1][15]},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道德理念和文化传统。这些观念和主张,与作为我们党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进行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党的作风,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个人生活作风^{[2][80]}。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收稿日期:2025-07-18

作者简介:司书岩,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汲取智慧和营养,这不仅是推动党的作风建设返璞归真、固本培元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邃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进行作风建设的重要滋养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脉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出,“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很少,我们的创造力,实事求是的本事还很弱”^[379],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452]。这是在党的会议上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1941年5月,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作出新的系统的理论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80],从而赋予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不仅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因子,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元素、中国智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概念和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作风建设的核心要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自信而坚

定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6209]他反复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7244],“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382],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8141]。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认真总结经验,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不断扩大,更加富有成效。”^[9163]胡锦涛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1049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1209]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吃饭”^[53836]的,“是靠实事求是起家 and 兴旺发展起来的”^[11],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什么时候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贯彻和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得到坚持和弘扬,党的事业就顺利推进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会遭受挫折。脱离实际误国,实事求是兴邦。新征程上,实现新的使命任务、战胜不期而至的风险挑战,必须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实事求是的深邃智慧,“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行动”^[11210],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并遵循规律,实事求是确定发展战略、谋划工作举措、推动决策落实,以良好思想作风保障和促进中国式现

代化行稳致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知行合一思想,是进行学风建设的重要滋养

勤勉好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好学者之“好”,好就好在知行合一上。“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明·王阳明:《传习录·陆澄录》)知行合一是古圣先贤修身治学的重要原则,知行合一的本质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亦即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所在。党的七大概括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第一条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5]1094}。学风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风气风格问题,究其根本是一个如何对待学习、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12]652}，“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3]。我们党历来重视学风建设，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5]812-813}邓小平同志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典范。他告诫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江泽民同志强调，“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14]。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10]498}。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5]，“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16]。学习在知行合一中深化，理论在知行合一中升华，事业在知行合一中推进。新征程上，实现新的使命任务、战胜不期而至的风险挑战，必须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学风建设滋养，始终坚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前提是“学”，真学才能真懂、真知。“知行合一”的“知”是对科学理论的深刻认知，要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牢牢把握其中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承载的道理学理哲理，真正知言晓义、融会贯通。核心是“信”，真信才能笃行。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唯有信，才能真正融入思想、融入灵魂，自觉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根本在“行”，笃行才是目的。“知行合一”的“行”是对科学理论的身体力行、对初心使命的躬身践行，要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指导推动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充分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思想魅力和实践

品格。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求真务实的价值观，是进行工作作风建设的重要滋养

“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清·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求真务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向推崇的价值观，神话传说中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惊人壮举，都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奋斗精神和顽强作风的传颂。求真就是探索真理、探求规律，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务实就是尊重实际、遵从规律，注重工作的实际成效。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符把“务实”作为君子之德，强调“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汉·王符：《潜夫论·叙录》）。清初思想家唐甄提出“为政贵在行”，强调“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清·唐甄：《潜书·权实》），认为只有拿出行动、真抓实干国家才能得到治理。求真才能务实，实干才能兴邦。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7]355} 求真务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一贯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15]801}，并告诫说，“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15]82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掷地有声地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江泽民同志强调，“在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首先要强调真抓实干，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18]68}。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的核心内涵，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10]15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16]，“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19]，号召全党“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20]109}。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1]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等深刻的民本思想，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15]665} 新征程上，实现新的使命任务、战胜不期而至的风险挑战，离不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离不开真抓实干的顽强奋斗。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东汉·荀悦：《申鉴·俗嫌》）等作风建设的智慧，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不断注入历史文化营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谋实招、干实事、务实功、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以上率下的治理智慧，是进行领导作风建设的重要滋养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汉·班固：《白虎通·三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以上率下。《墨子·经说上》中“所令，

非身弗行”、《盐铁论·疾贫》中“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汉书》中“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宋史·宋祁传》中“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等重要论述,强调的都是以上率下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领导作风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态度和行为^[2180]。“上之所为,人之所瞻。”(诸葛亮:《教令第十三》)好的领导作风是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以身作则带出来的。长征途中,管被装的军需处长被冻死在路上“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20]114-115},正是靠这种顽强的作风,红军赢得了长征胜利。延安时期,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一律参加生产,正是靠这种平等的作风,凝聚起战天斗地的磅礴力量,硬是把“到处是沼泽、遍地是泥潭”的南泥湾改造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2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曾一度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不吃肉,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22]472}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强调,“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18]177},“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6]14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20]304}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出台和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到高压惩治腐败、重拳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都是自上而下层层推动的^{[23]243}。“表态不如表率,身教重于言教。”^{[24]21}正是有了各级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的模范行动,才有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

不断开辟新境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25]59},以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25]67}。新征程上,实现新的使命任务、战胜不期而至的风险挑战,必须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以上率下的领导智慧,坚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身体力行改进作风,身先士卒当好表率,让以上率下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领导工作的常态、领导作风的底色,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正心修身思想,是进行干部个人生活作风建设的重要滋养

“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修身正己,强调家国一体,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在共产党人话语体系中,修身正己是干部个人生活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要任务。干部个人生活作风,是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是干部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和行为方式等在日常生活中的综合反映^[280]。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决定成败。领导干部个人生活作风不是小事,不仅关系到领导干部个人的形象,而且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北宋·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加强干部个人生活作风建设,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正操守、养心性、提高觉悟、升华境界的过程,要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已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25]24},在干事创业中历练作风,在为民造福中砥砺品格。一是要练“慎”功。《诗经·小旻》中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克己慎为是古圣先贤的处世智慧,也是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方式。“一着不慎,满盘皆输。”^{[26]175}党员、干部不仅要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站稳立场、保持定力,而且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坚持从小处着眼,在小事小节上管住自己,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要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以优良道德品格提升党性自觉、筑牢党性根基,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二是要正家风。“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家风不好,作风难正;后院起火必然殃及自身、祸及社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庭,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栖身之地、起居之所,而且还是教化家人的学校、示范社会的样板、引领风尚的航标^{[23]210},必须注重培育和传承良好家风,以好家风展现干部个人良好作风,在潜移默化中带动形成良好党风政风、社风民风。三是要守清廉。“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第八》)崇尚清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价值取向,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期待飞得持久、‘扶摇直上’是困难的”^{[27]9}。人生因廉而高洁,事业因腐而衰败。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保持清正廉洁作为一种政治自觉和价值追求,不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拒腐蚀、守清廉、防蜕变,始终以清廉本色示人,以清廉作风干事,以清廉行动为民,展现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

六、结语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宋·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25]53-54},告诫全党“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5]21}。优秀的文化从来都是历史的积淀,不断创造着的历史从来都是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党深化作风建设的本和源,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智慧源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一定要善于以古鉴今、执古御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作风建设滋养,筑牢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文化根基,不断消除不正之风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28],推动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持续好起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M].北京: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

- 出版社,2011.
-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9]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1] 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N].学习时报,2012-05-28.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二〇〇八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强调各级党校要突出抓好学风建设[N].经济日报,2008-11-13.
- [14] 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J].求是,1998(4):2-4.
- [15] 习近平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各级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N].人民日报,2024-03-01.
- [16]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 [19] 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求是,2023(13):4-16.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1] 王玉堂.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J].党政干部论坛,2022(2):4-6.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3] 王玉堂.卓越领导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 [24]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7]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28] 王玉堂.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3):3-10.

责任编辑:朱少家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仇丽萍

(东台市委党校,江苏 东台 224200)

[摘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作风建设面临着一些党员干部对作风建设存有错误思想认识、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变异性等问题和挑战。因此,必须加强理论武装,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防不良作风潜滋暗长;加强制度建设,筑牢作风建设“防火墙”;坚持明确责任压实责任,确保作风建设不空转;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让作风问题无处遁形;抓常抓细抓长,久久为功。

[关键词]新时代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作风建设 新成效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指出:“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1]70}“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1]72}“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1]4} 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些重要讲话,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优良作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一、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收稿日期:2025-07-20

作者简介:仇丽萍,中共东台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高级讲师。

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2]366}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党要管党怎么管?全面从严治党怎么严?该从哪儿抓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抓党的建设从抓作风建设切入,抓作风建设从制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成功解决了“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迈出了对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的关键一步。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开创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境界,取得了“八项规定改变中国”的巨大成效。新征程上,我们依然要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能否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14]。“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共

产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如果不吸取历史教训,不注重作风建设,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只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党的作风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什么时候加强作风建设,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忽视或放松作风建设,背离人民群众,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在长期实践中,重视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当前,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只有加强作风建设,才能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虽然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严峻挑战。

(一)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取得很大成果的同时,提醒全党,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抓八项规定这么长时间,仍有人当耳旁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积习难改,已成为阻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严重问题。”2022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仍有些人置若罔闻、顶风违纪。”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云南考察时指出:“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鉴于这些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建设“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要走出“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的怪圈,防止不正之风卷土重来。

(二)一些党员干部对作风建设存有错误思想认识

有的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是小题大做、与己无关;有的把收受土特产、年节礼品礼金、购物卡等视为正常的人情往来;有的心存侥幸,自认为做得隐蔽,不会被别人发现和查处;有的认为党员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开拓进取谋发展,作风上有点问题是小问题,无关紧要;有的认为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会影响经济发展和工作推进,妄图降调变调;有的存在“例外”思想,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特殊、岗位不同,要区别对待;有的存在“喘口气”“歇歇脚”的心理,抱着“差不多就行”“得过且过”的敷衍心态,不求作风建设的长效实效。诸如此类错误思想认识,导致作风问题

禁而不绝,死灰复燃。

(三)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和变异性

2013年8月,中央纪委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每月定期公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汇总情况。从公布的情况看,一些“四风”问题是经常发生的,呈现出顽固性、反复性特点。有的甚至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顶风作案,一边参加学习教育,一边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此外,“四风”问题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比如,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违规吃喝从酒店、饭店转入私人会所、农家后院、机关内部食堂等地,从吃公款到“吃老板”、“吃下级”、吃服务对象等。作风问题的反复性、顽固性和变异性,使得克服不良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

三、多措并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我们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一)加强理论武装,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员干部作风上出问题往往始于思想滑坡,抓好作风建设首先要找准思想根源。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各级党委(党组)和党支部的重要学习内容,作为各级党校的主要培训课程,提高学习和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补钙壮骨,固本培元,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学习,进一步增强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鼓励和督促党员干部加强自学,自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要加强警示教育,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防不良作风潜滋暗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要通过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纯洁党风的“净化器”,严防各种不良作风潜滋暗长。

严格组织生活,规范党员干部行为。要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基本制度,确保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严肃化。以正常有序的高质量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抵制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实践证明,在一个党组织内,如果“好人主义”大行其道,歪风邪气就会滋长,人心就会涣散,各种是是非非、团团伙伙就会出现,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党员干部要坚持党性原则,不当老好人,坚决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各级党组织也要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树立起正确的用人导向和价值取向,让坚持原则的好干部得到重用,让明哲保身的“老好人”失去市场。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正确、认真的态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要刀刃向内、揭短亮丑、刮骨疗毒,从党性修养上、从灵魂深处寻找问题的根源并解决问题;对他人提出的批评意见,要正确看待,虚心接受,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对同志要抛开面子、较真碰硬、敢于交锋,在直击问题要害、红脸出汗中来一场“思想上的大扫除”。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好头,既要指出下属或同级存在的问题,又要勇于自揭伤疤、开展自我批评,还要善于引导党员干部营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打消大家怕伤和气、怕“穿小鞋”、怕丢面子的顾虑,在相互提醒、坦诚交流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三)加强制度建设,筑牢作风建设“防火墙”

制度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要在作风建设实践中,认真总结好的经验做法,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制度、废止不适用制度,为作风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制度意识,自觉尊规学规守规用规,将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要经常对照检查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对于执行法规制度不严肃不认真不严格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四)坚持明确责任压实责任,确保作风建设不空转

坚持明确责任压实责任,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履责、担责,推动作风建设各项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持续取得实效。党委(党组)要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履行监督执纪问

责职责。党委(党组)书记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既要抓好分管领域的业务工作,也要抓好分管领域的党建工作。党员、干部要落实好具体责任,在党的组织活动中积极作为,树立新风、抵制歪风。要严肃问责,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确保管党治党责任得到落实。

(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让作风问题无处遁形

全面有效的监督是抓好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要加强党内监督,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党委(党组)要做好全面监督,纪委要做好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要做好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要做好日常监督,党员要做好民主监督。要贯通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民主监督等,形成监督合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重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群众监督的良好环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前哨”作用,支持和鼓励新闻媒体对党的作风进行舆论监督。要创新监督手段,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党员干部违规吃喝、违规使用公车等进行实时监测。统筹运用各类监督力量,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督体系,让各种隐形变异的作风问题无处遁形。

(六)抓常抓细抓长,久久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325]

抓常就是要经常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484]作风问题最容易死灰复燃,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

干群关系状况,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及时了解和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对于顶风违纪行为,要露头就打、从严查处。

抓细就是要抓小抓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作风问题总是由小及大、由风及腐。拿一瓶酒、收一包烟、吃一顿饭,不引以为戒,慢慢就会突破思想防线,让行为越界、权力脱轨。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作风建设要关口前移、抓小抓早、防微杜渐。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从具体问题管起,从小事抓起,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将作风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抓长就是要长期抓。作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所以要长期抓、见长效。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必要的,但是要彻底走出“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的怪圈,还是要靠坚持不懈。经过长期的努力,真正管出习惯、化风成俗。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4]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徐书琴

略论合肥出海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王智源 马科伟 王勇 刘安黎

(合肥市政协,安徽 合肥 230071)

[摘要]合肥市通过构建“五外联动”工作新机制,实施“徽动全球”万企百团出海行动,引导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实际工作中,产业链协同机制仍需加强、国际化服务生态亟须优化、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完善,要从聚力链群协同、创新金融护航、强化智力支撑、拓展多元市场、搭建智慧平台、深化数智赋能、讲好品牌故事等方面予以改善。

[关键词]合肥 出海企业 产业协同 数智赋能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明确指出要“稳定对外贸易发展。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十四五”以来,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合肥市不断做大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外向型经济,在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发展过程中,一批龙头企业通过技术突破和全球化布局,已成为“合肥制造”出海的标杆。2025 年上半年,合肥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51.7 亿元,同比增长 22.8%,

其中出口 1422.4 亿元,同比增长 22.1%,进出口、出口总值均创历史新高,且增幅在长三角万亿 GDP 城市中连续 6 个月排名第一位。全市出口机电产品 1134.9 亿元,同比增长 21.8%,占出口总值的 80%,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 200.7 亿元,同比增长 30.7%。

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形势愈发紧张,美国再次挥舞“关税大棒”,欧盟碳关税、南亚本土化生产要求等壁垒加剧,这对于合肥出海企业来说,既是避不开的挑战,亦是参与全球供应链重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机遇。

收稿日期:2025-07-21

作者简介:王智源,合肥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机关一级调研员,博士。马科伟,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市政协委员。王勇,合肥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工作处处长。刘安黎,合肥市社科联教研室四级主任科员。

一、合肥出海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025年以来,合肥市进一步创新思路,构建“五外联动”工作新机制,强化实施“徽动全球”万企百团出海行动,引导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但在实际工作推进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产业链协同机制仍需加强

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之间尚未形成紧密协作的关系,龙头企业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够深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存在“龙头强、配套弱”的问题,零部件企业海外布局滞后,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二)国际化服务生态亟须优化

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政策合规风险、文化差异、品牌认知断层和本土化能力不足等问题,如部分企业忽视目标国技术标准和碳足迹认证要求,导致项目受阻;部分企业未能深入理解当地消费习惯和社会价值观,导致市场开拓受挫;还有本地化产能和人才难以支撑海外业务开展。

(三)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完善

企业联盟信息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尚未贯通,海外园区建设滞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政府对优势产业出海的财政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不够完善,对企业的激励作用有限。

二、推动合肥企业出海的对策建议

为助力合肥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开辟出海“新航线”,推动更多优势产品更好地“走出去”,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聚力链群协同,打造一体化出海矩阵

鼓励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

能、智能家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共享信息、资源和技术,提升整体竞争力。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制定细分行业出海路线图,吸纳上下游关联中小企业加入供应链。强化比亚迪、江淮等企业“链主”地位,建设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整车+三电+后市场”一体化园区,推动配套中小供应商共同出海。依托阳光电源等龙头企业的全球项目经验,组建“光伏+储能+智能运维”产业配套联合体,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带动产业链企业出海。联合长三角申报企业服务中心,共享区域资源。

(二)创新金融护航,破解跨境发展难题

出海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化合作,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投资和贸易。加大对优势产业出海的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补贴和奖励基金。给予出海企业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海外投资和运营成本。开展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结算服务,对中小企业出口订单提供保费补贴。鼓励海外产业并购,并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开发汇率波动保险,允许企业凭出口订单数据获得免保证金套保额度,对新兴市场货币剧烈贬值造成的损失提供补偿。

(三)强化智力支撑,形成政企学研生态闭环

设立合肥产业出海智库联盟,充分调动政界、商界、学界智力资源,集聚企业高管、侨商侨领、海外高层次人才等,发挥其理念先进、经验丰富、熟悉海外市场的优势,协助出海企业进行战略研判、政策分析和项目评估,提高出海成功率。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出海企业共建海外研发基地,集中

研究力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

(四)拓展多元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探索“反向合资”模式,在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支持合肥优势企业与外资品牌、已成功出海的中国企业合作,借助其已有的销售服务网络进入海外市场,降低企业在目标国自建渠道的成本。指导企业根据原产地规则对出海供应链进行重新评估,如利用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累积规则整合原材料价值,通过调整关键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比例来重构产品原产地身份,降低关税成本。加大对企业建设、租用海外仓的支持力度,基于海外仓进行跨境供应链整合,提升仓配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保证物流时效性和配送安全性。在政权相对稳定、政策相对友好、处于“蓝海”状态的新兴市场国家做好本土化深耕,带动当地人就业增收、技能提升,增强出海企业与新兴市场之间关系的稳固性。

(五)搭建智慧平台,筑牢风险防控屏障

组织相关产业共同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推送国别政策、风险预警及供应链需求。建设技术服务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碳足迹核算、欧盟 CE 认证等“一站式”合规支持,规避政策和法律风险。建立关税与原产地政策追踪平台,重点关注美国商务部与美国海关,做好动态监测与敏捷响应。建立

隐私安全合规平台,加强数据要素等隐私保护合规建设,降低合规风险。

(六)深化数智赋能,激活产业升级引擎

加强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的数字化投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生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建立数字化的生产管理平台,实现跨行业、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构建数字化供应链协同平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综合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挖掘分析供应链数据,协助供应链的预测、规划和优化。

(七)讲好品牌故事,融入全球数字营销浪潮

支持企业与出海营销代理商合作,根据海外市场媒体偏好,借助多种海外头部媒体资源,形成立体化的媒体宣传推广格局,助力出海品牌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触达海外市场目标客户。从广泛的市场覆盖转向精准化、智能化、互动化的市场营销,培养海外消费者忠诚度,产生品牌溢价,弥补因关税提高等不利因素而造成的竞争劣势。召集合肥出海企业共创出海 IP,做好能与当地文化产生强烈共鸣的品牌叙事,增强宣传推广的感染力,树立可靠可信可亲的合肥品牌乃至中国品牌形象,在海外消费群体中破壁出圈。

责任编辑:徐书琴

关于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思考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黄春英

(江阴市委党校, 江苏 江阴 214431)

[摘要]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根基,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江阴市在平台整合、多元协同、统筹联动和法治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要以提高认知水平、优化体制机制、加强源头治理和强化技术支撑为抓手,深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基层 矛盾纠纷化解 多元共治 机制创新 源头治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专门部署,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和难点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不得当,不仅损害群众利益,而且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近年来,江阴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通过

平台整合、多元协同、统筹联动和法治保障等创新实践,探索制定基层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依法固效”系统性治理方案,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转型。未来江阴市如何持续深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还需进行深度思考。

一、江阴市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

(一)整合平台资源,搭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

积极整合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待中

收稿日期:2025-07-20

作者简介:黄春英,中共江阴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非诉讼服务中心等资源,全力打造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一站式”平台。创新设置人民调解、医患纠纷调解等多个服务窗口,优化流程,并安排专人值班,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一站式”平台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集中、高效处理的场所,群众无需奔波于多个部门之间,矛盾纠纷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甚至当场化解,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有力地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量矛盾纠纷在“一站式”平台得以快速解决,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大幅提升,2024年以来,江阴市民事诉讼案件同比下降24.14%,民事案件万人起诉率同比下降20%^[1]。

(二)注重多元协同,完善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深化跨部门协作机制,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派员常驻江阴市综治中心,住建、卫健等19个行业主管部门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派员轮流入驻,10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特色工作室(站)以及仲裁、心理服务等组织入驻,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建立跨部门联合研判机制,实行月度定期研判、重大节点每日会商、紧急事项即时研判的工作模式,确保预警信息精准推送,推动责任主体快速响应和处置。遵循系统集成、效能聚合、协作联动原则,推行“法院+N”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劳动争议、金融、道路交通纠纷调裁中心,形成“法院+司法+工会+代表+仲裁”劳动争议一体化化解机制。创新行政应诉案件协调化解及败诉通报机制,强化部门协作与府院联

动,召开行政争议跨域协调座谈会,全面梳理在审复议、诉讼案件,加强风险研判,通过行政和解、行政自纠等方式实质性化解涉案纠纷。通过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提质增效。

(三)加强统筹联动,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加强阵地建设,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组织网络。完成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形成376个人民调解组织,全面覆盖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与协同处置。针对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等高频纠纷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机构,并推动大中型企业建立企业调解委员会。在司法行政机关及基层执法单位派驻26个专业调解站点,培育形成20个调解服务品牌项目。强化队伍建设,锻造“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高素质调解队伍。按照市镇村各5人、2人、1人和行业调解组织3人以上的标准,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全市调解组织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率达到95%以上。充分利用乡贤、“五老”、社工、志愿者等力量,壮大和优化兼职调解员队伍。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典型案例分析研讨等培训,全面提升调解队伍专业化水平。突出机制建设,不断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能力。深入开展“千名调解员入网格进万家”活动,健全网格对接机制,确保矛盾线索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介入。健全分析研判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常规月报+重大直报”分级分类报告制度,推动调解工作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健全源头预防机制,构

建市、镇(街道)、村(社区)分级定期排查机制,重点时段围绕“人员、苗头、源头”强化网格化筛查,形成24小时响应机制。

(四)强化法治保障,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积极探索多元化解纠纷机制,运用“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双结合模式,高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将司法确认嵌入调解流程,既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纠纷的进一步扩大。创新“立审执破”一体化机制,着力破除传统诉讼流程中立案、审判、执行、破产环节的条块分割弊端。以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为导向,通过优化机制、信息共享、联合研判,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四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与双向互动,提升司法服务的系统性和实效性。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通过法律服务下沉,防范经济矛盾外溢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定期开展“送法入企”等专项行动,组织法律顾问入企普法,重点针对企业运营中的合同缔结、财产保全、劳资关系、诉讼风险等关键环节提供现场法律诊断。通过沉浸式普法教育引导企业建立法律风险动态评估体系,不断提升法治素养和契约精神,增强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感。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先后成立10个法律援助工作站、32个法律援助联络点,形成覆盖城乡的基层法律服务网络体系^[2]。构建劳动监察与法律援助协同响应机制,打造“调解—仲裁—诉讼”纠纷化解闭环体系。

二、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在思想认识上,干群认知有偏差

部分基层干部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系统性认知不足,仍采用“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粗放式处理模式。例如在处理邻里纠纷时仅满足于即时平息冲突,忽视对产权、公共空间使用等深层次矛盾的化解,导致同类纠纷反复发生。群众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渠道的知晓度有待提高,部分群众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采取信访、上访等传统方式,甚至采取极端行为来表达诉求,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引起重视、快速解决问题。

(二)在体制机制上,协调联动机制不完善

协调联动机制尚不完善,主要是部门之间存在职责不清、沟通不畅、协调困难等问题。例如在拆迁安置小区矛盾纠纷处理中,住建、城管、社区等主体常因权责边界模糊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流程规范尚未统一,部分调解人员习惯于依赖经验“断案”,对调解不成的纠纷,缺乏明确的转办、移送机制,容易造成纠纷拖延和积压。

(三)在源头治理上,预警排查不到位

风险预警防范机制不健全,对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类因素,未能及时进行监测和分析。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前,相关部门没有对其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和居民的意见分歧等进行提前摸排,最终导致矛盾升级、项目停工。有的虽然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但排查不深入、不细致,对老旧小区改造中的隐性利益冲突发现不足,难以实现“治未病”目标。

(四)在技术赋能上,数字化应用滞后

基层治理数字化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矛盾纠纷数据分散在信访、司法、社区等多个系统,尚未形成统一数据库,不同单位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不足。智能预警模型覆盖率不足,无法对物业纠纷、劳资争议等高

频矛盾进行趋势预测。移动端调解平台使用率不高,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线上参与存在障碍,使用性数字鸿沟亟待弥合。

三、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认知水平,培育多元共治的治理思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打破“政府主导”单一治理思维,培育“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思维,是优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认知转变需要从基层干部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同步推进。在基层干部层面,要变管控思维为服务思维,化维稳压力为治理动能。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定期开展政治能力提升、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等培训班,通过专题讲座、典型案例、实地参观等方式,了解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工作方法和核心要求。完善以就地化解率、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将矛盾纠纷化解实效纳入干部绩效考核指标,倒逼基层干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在社会公众层面,要强化依法理性维权意识,纠正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错误认识。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政务新媒体开设矛盾纠纷化解“微课堂”,线下在社区打造合法维权“示范角”,用身边案例推动法治意识入脑入心。创新公众参与机制,通过选聘“百姓评理员”“社区观察员”等方式,让群众深度参与纠纷调解过程,提升公众对矛盾纠纷化解的认同感。

(二)优化体制机制,构建全域联调解纷新格局

优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体制机制,关键在于突破部门壁垒与层级限制,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一要强化部门协同。全力推进“一站式”平台规范化建设,在乡镇(街道)层级整合信访、司法、公安、人社等多个部门的调解资源,设立实体化运行的调处中心,实行“统一受理、分类调处、归口办理、限时办结”的闭环工作机制。二要规范解纷流程。按照法治化“路线图”,制定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指导手册。依据《人民调解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明确纠纷受理、调查取证、调解实施、协议履行等环节的操作标准。建立“调解—仲裁—诉讼”衔接机制,对调解不成的纠纷,由调处中心出具《纠纷处理建议书》,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宜的法律途径,并同步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实现解纷流程的无缝对接。三要整合调解力量。进一步优化“专业+志愿”的调解队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入驻调处中心,负责复杂纠纷的法律分析与心理疏导。积极吸纳退休法官、社区乡贤等人员组建志愿调解队伍,发挥其地缘、人缘优势化解邻里纠纷。建立“调解人才库”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案例评查,实行星级评定与激励机制。

(三)加强源头治理,构筑预防为先的风险防控机制

源头治理是通过风险防控前置化,将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关键环节。一要强化风险预警机制。依托“基础网格+专属网格”网格化管理体系,基础网格由社区工作者负责日常信息采集,专属网格由专门为工业园区、商圈等特定区域配备的专职网格员采集信息,确保精

准防控真正落到实处。通过采集风险信息、录入“一站式”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打造风险评估模型,围绕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等纠纷类型设定预警阈值,自动生成高风险主体清单。构建“红黄蓝”三色预警响应机制,红色预警由党委政府牵头处置,黄色预警由部门联合化解,蓝色预警由社区自主处理,实现风险分级管控。二要强化矛盾排查机制。聚焦房地产物业、劳动保障等矛盾高发领域开展专项排查,建立“一矛盾一档案”,明确责任单位和化解时限,实行“销号管理”。针对老旧小区改造、乡村振兴项目等易引发纠纷的工作,建立“项目前期风险评估—实施中矛盾跟踪—竣工后效果评估”的全周期排查机制。三要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结合“八五”普法,编制《基层常见纠纷法律指引》,以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讨薪等案例解读《民法典》《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条文。创新“沉浸式”普法,在社区设立“法治议事厅”,围绕小区停车费调整、宠物管理等热点问题,组织居民开展模拟调解、法律辩论等活动,在互动中强化规则意识。

(四)强化技术支撑,促进数字和治理深度融合

“数智化赋能”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通过信息技术打破时空限制,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一要建设数据共享平台。按照“市级统筹、镇(街道)汇聚、村(社区)应用”架构,建设全市统一的矛盾纠纷数据库,整合法院、信访、公安等多个部门的纠纷数据,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建立数据质量管控机制,定期开展数据清洗与校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为后续应用奠定基础。二要打造智能应用系统。开发矛盾纠纷智能分析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纠纷文本,自动识别核心诉求与争议焦点。借助机器学习算法挖掘历史数据中的关联规律,例如分析发现“气温升高+物业费上涨”与物业纠纷发生率存在显著相关性,为精准防控提供依据。构建“纠纷热力图”,实时展示各区域纠纷密度与类型分布,辅助资源调配。三要拓展线上服务渠道。打造“掌上调解”平台,实现纠纷调解在线申请、视频调解、电子签章等全流程功能,当事人可通过人脸识别实名认证,上传证据材料,与调解员进行高清视频沟通。开发“调解资源地图”小程序,用户可查询附近调解员信息与专长领域,自主选择服务。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提供“语音引导+放大字体+人工代操作”等技术服务,避免因技术门槛形成服务壁垒。

参考文献:

- [1] 江阴市委宣传部.找准矛盾调解“金钥匙” 调出基层治理大和谐[EB/OL]. (2024-07-18)[2025-07-10]. <http://www.js.xinhuanet.com/20240718/11d4331bdc41adbd17cd5b3f6d29b5/c.html>.
- [2] 江阴市司法局.法援小站点 释放维权大能量[EB/OL].(2024-03-01)[2025-07-12]. <http://www.jiangyin.gov.cn/doc/2024/03/01/1211863.shtml>.

责任编辑:徐书琴

通州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张梅

(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江苏 南通 226300)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南通市通州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关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南通市通州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健康服务体系、深化医养融合、优化服务供给、统筹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调发展、加强为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南通市通州区 多层次 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4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2][38]}。截至 2024 年末,南通市通州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7.1 万,占总人口的 33.4%,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28.67 万,占总人口的 25.8%,通州已经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总体呈现出规模大、发展快、空巢多、高龄化趋势明显等特点。随着《南通市养老服务条例》的颁布施行,顺应南通市通州区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趋势,加快构建具有通州特色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刻不容缓。

一、南通市通州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

近年来,南通市通州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努力推进养老体系建设,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运作,积极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融合为方向、信息服务为辅助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通州区养老服务业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态势,养老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一)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

为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通州区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

收稿日期:2025-07-19

作者简介:张梅,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高级讲师。

善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南通市通州区基本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有效促进了通州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促进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先后出台了《通州区规范和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办法》、《通州区民办养老机构扶持政策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等。针对居家和社区养老，又出台了《关于实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绩效考评管理的通知》，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常态化运营。为全面落实省、市“舒心助餐”服务能力提升要求，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助餐服务需求，出台了《南通市通州区推进舒心助餐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这一系列政策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扎实推进

一是不断拓展完善居家养老项目。目前，通州区为8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中的中度、重度失能老年人等9类对象提供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依托政府购买服务落实对通州区重点空巢独居老年人关爱探访工作。为困难老人及有需要的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提升居家养老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二是不断提升“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质量。通州区依托本地国企南通鑫汇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探索建立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管理、全天候响应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搭建智慧养老云平台，通过其对接南通市居家养老公共服务平台；另一方面提供“69912349”为老服务热线，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为通州区老年人提供紧急援助、主动关爱等服务。三是不断推动“融合式”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近年来，通州区在镇(街道)改造提升25个示范性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4个街道通过新建或改造均已建成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到目前

为止，通州区标准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实现全覆盖，14个镇(街道)全部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32个村居全部建立标准化居家养老服务站。

(三)机构养老服务水平逐步提升

通州区机构养老已形成高、中、低档结合，医、养、康、护功能齐全，公办公营、民建民营、社会投资兴办、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并行的养老服务发展格局。通州区在运营养老机构29家，养老机构床位数7231张，星级养老机构达86%。突出重点发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通州区共建成二级以上老年病医院1家，专业养老护理院7家，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4家、社区护理站5家，所有养老机构就近与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通州区护理型床位达到5907张，占养老机构床位的81.7%。推动养老机构走连锁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路线。上海红星养老集团投资约1亿元改造先锋红星养老院和富锋护理院，共设养老床位达1000张；上海仁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投资4500万元建设天霞护理院，设有养老床位350张。不断推动运营方式创新发展。通过公建民营、整体服务外包、体制改革以及委托运营等方式，有效激发了养老机构活力，提高了管理服务水平。

二、南通市通州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服务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城乡分布来看，通州主城区的养老服务资源相对丰富，无论是养老机构的数量、质量，还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都明显优于乡镇。在城区，有较为成熟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而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起步晚，优质服务设施和服务供给较少，部分村居的居家养老服务站缺乏实质性的服务内容。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

水平呈正相关,经济较发达的镇街,养老服务投入相对较多,服务项目也更为丰富;而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人员配备、服务开展等方面都面临较大困难。

(二)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符合通州区老年人特点的综合连续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建成。通州区虽建有一所 100 张床位的南山老年病医院,但属于民营医疗机构,只对在南山养老院内的老人提供服务。老年医学科建设起步较晚,通州区 6 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仅人民医院、中医院两家建有老年医学科。此外,通州区还存在老年康复护理专业人才匮乏、基层医疗机构在老年健康管理中作用发挥不够、基层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三)医养结合深度不够

虽然通州区在医养结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依然存在部分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仅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融合的问题。一些养老机构虽然与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实际运作中,双方信息沟通不及时,转诊流程不顺畅,导致老年人在需要医疗服务时,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治。目前,医养结合服务的医保报销政策还不够完善,部分医养结合服务项目未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也限制了医养结合服务的推广和发展。

(四)为老服务专业人才短缺

就通州区目前的情况来说,一方面,养老服务人才需求缺口大,现有从业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养老服务工作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普遍存在招人难、留人难、队伍不稳定等难题,难以满足高质量的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老年康复护理

专业人才匮乏。多数老年医学科从业人员没有经过正规专科培训,缺少专业的老年病医生,老年医学科专科护士、康复护理人员特别是专业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此外,既懂医疗又懂养老服务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三、南通市通州区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

针对上述矛盾和问题,通州区要在老有所养上持续用力,全方位推进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一)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一要合理布局养老服务资源。加大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改建一批标准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养老睦邻点等,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特点,建立“一户带多户”的邻里照护网络,通过“邻里互助”等形式,扩大服务覆盖面,弥补专业资源不足。二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目前,通州区一般的农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大多只有几百元,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能力。三要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养老心理。当前要加大孝文化的宣传力度,促进农村老年人树立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型养老观,促进“物质养老”向“物质养老与精神养老并重”方向发展。四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村地区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运营经费等方式,引导优质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缩小城乡养老服务差距。

(二)健全健康服务体系

当前,通州区要将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一要加大扶持力度。根据国家卫健委等8部委颁布的《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加强统筹规划,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增强老年医疗和医养体系的服务能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以及医养结合机构。二要夯实服务基础。加大资金投入,用于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硬件改造,尽快实现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全覆盖。按照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标准,有序改善基础设施,开展危旧房屋整治,合理布局业务用房,优化诊疗就医环境。定期对基层现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梳理和排查,及时做好维护更新工作。以通州区中医院搬迁后院区规划调整为契机,适时启动公办老年病医院建设项目,以新建老年病医院为龙头,带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科建设,切实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数,满足失能失智老年人康复救治需求。三要做实老年健康管理。做好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体检质量,及时反馈结果,科学评估、指导。依托区级龙头医院,建立远程会诊、影像、心电中心,实现影像和检验数据共享,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有与二三级医院同等质量的诊疗服务。

(三)深化医养融合

1.深化医养机构合作

其一,推动实质性业务融合。组建“区级医院老年病科+镇(街道)卫生院医养中心+村(社区)医养结合站”三级网络,区级医院负责急重症诊疗,镇(街道)卫生院提供康复护理,村站承担健康监测与基础照护。

将村(社区)卫生室与村(社区)养老服务站合并,村(社区)医生兼任养老服务指导员,实现“小病不出村(社区)、慢病有管理”。其二,完善信息共享平台。投入专项资金搭建区域医养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养老机构健康监测数据、医院诊疗记录及医保结算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老年人病历、用药、检查报告等数据实时互通,避免重复采集信息,提升诊疗效率与精准度。

2.创新医养服务模式

其一,构建互助式医养模式。同时代的人拥有同一个年代的认同感,更能理解同年代人的诉求^[9],当前可以尝试由村(社区)组织动员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陪诊、购药等服务,服务时长兑换“养老积分”,可在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兑换免费体检或中医理疗。其二,构建差异化协同发展模式。在城市社区大力推广“嵌入式”医养结合模式,在条件成熟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内嵌入“微型护理站”或“家庭医生工作室”,让老年人步行15分钟之内即可到达最近的站(室)。在农村地区则大力推广“流动医养车”巡回服务模式,村卫生室医生提前统计村民需求,服务车抵达后,村卫生室医生协助开展随访,建立“动态健康档案”,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的医养服务。

3.优化医保政策体系

其一,扩大医保报销范围。联合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对医养结合服务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将养老机构内的康复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刚需服务纳入医保报销目录。探索“长护险+医保”的复合支付模式,为长期照护需求提供多元化保障。其二,简化报销流程。推行医保“一站式”结算服务,对符合标准的医养结合服务项目实行快速审批,打破养老机构与医院间的结

算壁垒,实现跨机构费用直接结算。其三,加强医保政策宣传,通过社区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提升群众对医保报销政策的知晓度。

(四)优化服务供给

围绕绝大多数老年人“家门口养老”的刚性需求和现实需要,当前要巩固居家养老服务基础地位,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结合《南通市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十项工程行动方案》要求,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品牌打造为抓手着力构建“15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借鉴南通市崇川区“一综多专、智链万家”的总体思路,通州区可确立“一核多维”的发展方向。“一核”即以居家养老为核心,围绕老年人居家生活需求,提供基础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服务。参考南通市崇川区“濠享福”模式,建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机制。为居家老人安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掌握老人健康与安全状况。整合家政、医疗等方面的社会资源,推出“居家养老服务包”,由政府补贴部分费用,降低服务成本,让居家养老更安心。“多维”则是拓展社区、机构、信息技术等多个维度的支撑。发挥好已建成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作用,提供日间托养、康复护理、老年学堂等服务。鼓励社区与周边商家合作,建立“养老服务联盟”,为老人提供购物优惠、送餐上门等福利和服务,增强社区养老的生活便利性。引导养老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立协作关系,养老机构可向社区开放专业医疗资源包括康复设备等,为社区老人提供定期体检、康复训练指导;社区则将有更高照护需求的老人转介至机构,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衔接,提升整体养老服务能力。进一步做优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挥好通州区智慧养老云平台的作用,不断拓展平台的服务类型和范围,进一步

整合政府兜底服务项目和企业收费服务项目,让老人通过平台同时获取不同层级的服务,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五)统筹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作用,形成事业带动产业、产业支撑事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注重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调发展,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引进或培育连锁品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在条件成熟的城乡社区尝试推广“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不断扩大养老服务消费。结合通州区当地生态资源,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养生旅游、康复疗养项目,如生态农庄采摘、中医理疗体验等,丰富养老服务内涵,打造具有通州特色的医养康养结合品牌。依托今年通州区新评为长三角旅居养老地的两家养老机构(南山颐养中心、悦慈老年公寓)、健康养老目的地(南通开沙岛旅游度假区)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发展老年休闲养老旅游业,鼓励引导养老机构和旅游行业开展旅居式养老、候鸟式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发挥通州区家纺产业的优势,鼓励企业开发功能性老年家纺产品,引导家纺企业向银发经济领域拓展。此外,利用江苏省今年全覆盖建设适老生活体验馆的契机,大力引导专业适老化产品企业入驻,为广大老年人提供适老化产品咨询、体验、辅具租赁等综合性服务,让老年人也能拥抱智慧生活。

(六)加强为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一要加强人才引育。持续提高新入职养老服务机构医护岗位人员岗位补贴标准。针对养老机构,对于薪资支出超出通州区平均工资120%的部分,给予企业所得税10%的减免,(下转第52页)

论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周鑫 薛勇

(廊坊师范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注入新动能,在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等领域成效显著,如智能政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智能监管系统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但实践中仍存在技术、制度、数据、伦理及人才等多方面问题,技术上算法黑箱与适配难题凸显,制度上法律法规滞后且监管存在空白,数据治理面临共享壁垒与质量隐患,伦理层面算法歧视损害权利公平,人才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为此,需通过技术优化破解算法风险、完善制度规范填补法律空白、深化数据治理打破信息壁垒、强化伦理与权利保障机制、健全人才支撑体系,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人工智能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政务服务 市场监管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下,人工智能作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政府治理的理念与模式。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核心在于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政务活动的法治化、规范化与高效化。“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1]人工智能与数字法治政府的融合,既催生了智能政务

服务、精准市场监管等创新实践,大幅提升了行政效能与公共服务质量,也为破解传统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失衡等难题提供了全新路径。然而,技术赋能的同时,算法黑箱、数据安全、制度滞后等问题逐渐显现,对法治的公平性、透明性与权利保障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场域,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探索切实可行的路径,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应用与法治建设的良性

基金项目:2025年度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人工智能赋能廊坊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研究”(立项编号:2025058)。

收稿日期:2025-07-22

作者简介:周鑫,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薛勇,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廊坊审计中心二科科长。

互动,更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场域

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融合已进入深度实践阶段,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监管体系智能化升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成果。“政府决策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和分析,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对庞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供决策者参考。”^[12]这些实践不仅重塑了政府治理的技术范式,更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和智能协同的运行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向精细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一)政务服务

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领域已实现从局部试点到全域渗透的转变,构建起以“智能响应+跨层协同”为核心的便民服务生态。通过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将政务服务场景延伸至移动端与线下窗口,打破传统服务的时空限制,群众与企业可通过政务平台获取政策咨询、业务办理等全流程支持。“大模型凭借其技术优势通过推动政府降本增效、助力数字政府决策、塑造新的政务服务模式,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创造全新的发展机遇。”^[13]同时,跨层级协同成为政务服务智能化的重要突破方向,部分城市搭建覆盖多级行政区域的人工智能政务平台,整合各部门业务模块,统一审批流程与服务标准,群众借助智能终端即可完成材料提交、进度查询等操作,实现“数据流转替代人工跑腿”,有效破解部门间数据壁垒与服务碎片化问题,“数字政府服务‘放管服’改革和助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愈发显著”^[14],推动政务服务从“分散办理”向

“集成化供给”转型,进一步增强便民属性、提升行政效率。

(二)市场监管

人工智能推动市场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事后查处”向“智能预警+事前预防”升级,形成全链条、精细化的监管体系。在风险防控环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市场主体数据、投诉举报信息等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算法自动识别新兴市场风险与违规线索,过滤无效信息以减轻基层核查压力,助力监管部门提前介入潜在问题领域。执法规范化层面,搭建人工智能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将法律依据、裁量标准等嵌入执法全流程,执法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即可生成任务清单、调取电子证件,系统自动校验执法行为合规性,避免执法随意性。此外,在公平竞争审查领域,探索“人工智能初筛+专家复核”的协同机制,对政策文件进行智能化审查,及时纠正可能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条款,保障市场环境的有序与透明,推动监管方式方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

(三)公共法律服务

人工智能正重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有效破解基层服务资源不足、覆盖不均的难题,构建起普惠化、智能化的服务网络。通过开发人工智能服务终端与线上平台,打造“全天候”法律服务渠道,群众可通过小程序、智能设备获取法律咨询、文书起草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还可针对偏远区域优化服务推送算法,实现法律服务的精准触达,让优质法律资源跨越地理限制。在普法宣传领域,人工智能推动宣传模式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结合地方文化特色,推出“普法AI场景”项目,通过智能机器人、互动视频等形式开展法治宣

传,增强普法内容的趣味性与传播力,同时借助人工智能分析群众法律需求,精准推送个性化普法内容,提升法律知识普及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强化公共法律服务的均等化与可及性。

(四)应急管理

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应急管理精准性与前瞻性的关键技术支撑,在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深化数字赋能监管是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任务,要把传统上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判断监管,转变为主要依靠数据的自动化决策监管”^[5]。在极端天气与灾害监测领域,引入人工智能预报模型,整合卫星数据、气象信息、生态指标等多维度数据,生成精细化预测结果,精准判断灾害发生趋势、影响范围与潜在风险,为提前部署防御措施争取更多时间。还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灾后处置与资源调度,通过开发专项系统提供灾害预警、农业恢复建议等定制化服务,助力灾后重建工作科学推进。此外,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开展灾害模拟推演,通过分析海量历史数据与实时信息,模拟不同灾害场景下的演变规律,为应急防御规划、资源储备布局提供数据支撑,推动应急管理从“经验应对”向“科学决策”转型,进一步提升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

二、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与风险传导

人工智能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应用仍受到技术本身的限制,且风险易在治理流程中传导扩散,从而削弱赋能效果。一方面,算法偏差与场景适配不足问题突出,部分人工智能模型依赖历史数据训练,若数据中隐含行政偏好或社会偏见,易导致

决策结果偏离公平性原则,例如在政务服务资格审核、市场监管风险评级等场景中,可能出现对特定群体的不合理筛选或误判。同时,复杂治理场景下技术适配能力不足,面对基层政务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应急管理的动态变化情境,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常因场景颗粒度不够精细、参数调整不及时,出现响应滞后或判断失准,难以完全匹配实际治理需求。另一方面,技术风险存在传导放大效应,人工智能系统的关联性使得某一环节的技术故障可能影响整体治理流程,例如政务服务平台的算法漏洞可能导致群众办事流程中断,且此类风险若未及时发现,易从技术层面传导至行政决策、公共服务等领域,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与公众权益,形成“技术缺陷—治理失误—信任危机”的传导链条。

(二)制度规范的滞后性与监管空白

当前,针对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规范未能跟上技术应用步伐,且监管体系不完善。其一,现有法律法规对人工智能应用的规范与约束不足,多数现行制度仍以传统行政模式为基础,未充分涵盖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公共服务等新型场景,例如对人工智能生成的行政决定的法律责任归属、数据使用的边界划分等关键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规范,导致实践中各地操作标准不一,易引发法律纠纷。其二,监管体系不完善。一方面,人工智能监管涉及网信、政务服务、司法等多个部门,各部门监管职责划分模糊,缺乏协同联动机制,易出现“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现象;另一方面,现有监管多聚焦于技术安全层面,对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公平性、透明度、伦理合规性等维度的监管力度不足,例如对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问题的监

测与惩处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防范技术应用中的潜在风险，无法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三)数据治理的碎片化与质量隐患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赋能的核心要素，其治理过程中的碎片化问题与质量隐患，严重制约人工智能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应用效能。从数据碎片化来看，部门间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部分政府部门出于数据安全、管理便利等因素考虑，仍保留各自的数据管理体系，导致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数据难以实现有效共享，例如政务服务部门无法及时获取由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企业信用数据，使得人工智能模型因数据来源单一、覆盖范围有限，无法形成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影响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从数据质量来看，现有政府数据存在多方面隐患：一方面，部分数据采集过程缺乏标准化规范，数据格式不统一、关键信息缺失等问题较为常见，例如市场监管中的企业信息登记数据、公共法律服务中的群众咨询记录等，存在数据录入不完整、更新不及时的情况；另一方面，数据清洗与校验机制不完善，大量冗余数据、错误数据未得到有效过滤，导致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与应用过程中出现“垃圾数据进、垃圾结果出”的现象，例如应急管理中的灾害监测数据若存在误差，可能导致人工智能预警系统误判灾害趋势，影响应急处置的及时性与准确性。

(四)伦理风险与权利保障的失衡

人工智能在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易引发多重伦理风险，导致公民权利保障与技术应用之间出现失衡。其一，隐私与数据权益面临被侵犯风险，人工智能应用需收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与政务数据，

部分政府部门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范围过宽、告知不充分等问题，且数据存储与使用环节的安全防护措施不足，易出现数据泄露等情况，例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在采集群众咨询信息时，可能过度收集与服务无关的个人隐私数据，政务服务系统的安全漏洞可能导致公民身份信息、办事记录等被非法获取，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与数据权。其二，算法歧视引发权利公平问题，部分人工智能模型因训练数据偏差或算法设计缺陷，在行政服务等场景中出现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对待，例如在政务服务的福利分配、市场监管的信用评级中，算法偏好可能导致弱势群体获得的服务资源减少，从而损害权利公平。

(五)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与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且政府工作人员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治理理念等存在结构性短板，制约技术赋能的实际效果。一方面，人才队伍存在“供需错配”问题，当前既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原理，又熟悉政府治理流程、具备法治思维的复合型人才较为稀缺，政府部门在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的开发、维护等环节，多依赖外部技术团队，缺乏内部专业人才支撑，导致技术应用与治理需求之间难以实现深度契合。在这方面，基层政府部门的人才短板更为突出，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缺乏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认知，难以有效运用智能政务平台、市场监管系统等工具，导致技术资源在基层治理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治理能力与技术应用需求不匹配，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仍保留传统行政思维，对人工智能赋能的认知停留在“技术工具”层面，未能从治理模

式创新的高度运用人工智能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例如在公共法律服务中,仅将人工智能作为简单咨询工具,未充分利用其数据分析能力精准匹配群众需求;同时,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治理能力不足,缺乏对算法偏差、数据安全等问题的识别与处置能力,难以有效防范技术应用中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制约人工智能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深度应用。

三、促进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经历了信息化、数据化阶段之后,目前开始向智能化阶段迈进。”^[9]针对人工智能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暴露的技术局限、制度滞后、数据治理的碎片化等问题,需要构建“技术优化—制度保障—数据治理—伦理规制—人才支撑”的体系,通过系统性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推动人工智能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良性互动。

(一)构建技术治理框架,破解算法风险与适配难题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与风险传导问题,需从技术治理全流程入手,构建“风险防控+场景适配”的立体化框架。一方面,建立算法透明化与审查机制,推动政府部门在人工智能系统上线前开展算法影响评估,重点审查决策过程及依据、数据来源及潜在偏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核心领域(如政务服务资格审核等),要求公开算法原理与决策依据,邀请技术专家、法律学者及公众代表参与评估,确保算法公平性与可解释性;同时,开发算法监测工具,对运行中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实时跟踪,自动识别算法偏差、异常决策等风险,建立风险预警与快速修正机制,避免风险在治理

流程中扩散。“应当为算法工具制定具体的法律和监管机制,以有意义地实现透明度原则”^[10]。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场景动态适配能力,鼓励政府部门联合技术企业针对不同治理场景(如基层政务服务、突发应急事件等)开发定制化人工智能模型,结合场景需求优化算法参数与功能设计,例如在应急管理场景中,提升模型对动态数据的实时分析能力;同时,建立技术迭代反馈机制,收集一线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对改进、完善人工智能系统的意见和建议,定期更新模型训练数据与功能模块,确保技术应用与实际治理需求深度契合,破解“技术与场景脱节”难题。

(二)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填补法律空白与监管盲区

针对制度规范滞后与监管空白问题,需从立法、监管机制两方面发力,构建“静态规范+动态监管”的制度保障体系。其一,加快专项立法进程,明确人工智能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法律定位,针对关键问题制定统一规则。界定人工智能生成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明确政府部门、技术提供方、使用人员的法律责任划分;规范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数据收集范围与使用边界,明确禁止超范围采集公民个人信息与政务数据;细化算法歧视、技术故障引发损害的赔偿机制,为实践操作提供明确法律指引。其二,优化监管协同机制,整合网信、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管职能,建立跨部门人工智能监管协调小组,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与流程,避免“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同时,创新监管方式,引入“监管沙盒”模式,对新型人工智能应用进行试点监管,在可控环境中测试技术安全性与合规性,积累监管经验后逐步推广。其三,建立监管

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技术发展趋势与治理实践反馈,定期修订监管规则,确保制度规范始终跟上技术应用步伐,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

(三)深化数据治理改革,打破信息壁垒与质量瓶颈

针对数据治理碎片化与质量隐患,需以“数据共享+质量管控”为核心,推进数据治理体系改革。其一,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由政府牵头建立跨领域、跨层级的政务数据共享中枢,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责任,将政务服务、市场监管、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核心数据纳入共享范围,制定标准化数据接口与共享流程,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同时,建立数据共享激励与约束机制,对积极提供高质量数据的部门给予表彰、奖励,对无故拒绝共享或隐瞒数据的部门进行批评甚至问责,确保数据资源高效流转,为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全面、多元的数据支撑。其二,强化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在数据采集环节,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明确数据录入规范与必填要素,引入智能校验工具实时检测数据完整性与准确性,避免错误数据录入;在数据存储环节,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定期开展数据清理工作,删除冗余、失效数据;在数据使用环节,开发数据质量评估工具,对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的数据进行实时质量监测,一旦发现数据质量问题立即暂停模型使用并启动数据修复,确保“优质数据进、精准结果出”,为人工智能赋能提供可靠数据基础。

(四)强化伦理与权利保障,防范算法霸权与权利受损

为平衡人工智能应用与公民权利保障,

需构建“伦理引领+权利救济”的双重保障体系。“人的尊严是数字法治的伦理基础”^[8]。一方面,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审查机制。政府部门应制定人工智能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伦理准则,明确“以人为本”“公平公正”“隐私保护”等核心原则,要求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与应用过程中严格遵循伦理要求;在系统上线前,开展伦理审查,重点评估系统是否存在侵犯隐私、引发歧视、损害公共利益等伦理风险,对高风险应用(如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决策系统)实施更严格的审查标准,必要时组织科技伦理专家、公众代表开展听证,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社会伦理价值。另一方面,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在隐私保护层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底线观应以触及社会秩序底线为标准”^[9],严格落实“最小必要”原则,限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采集范围,采用匿名化、去标识化等技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建立数据泄露应急预案,一旦发生泄露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依法追责;在反算法歧视层面,建立算法公平性审查制度,定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结果进行抽样分析,排查是否存在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结果,若发现问题,则应针对该问题及时优化算法;在权利救济层面,简化公民因人工智能应用受损的维权流程,明确举证责任分配(适当减轻公民举证负担,要求政府部门与技术方提供算法原理与数据来源),设立专门的维权渠道(如线上投诉平台、线下维权窗口),为公民提供便捷的权利救济途径,确保技术赋能不偏离法治轨道。

(五)健全人才支撑体系,弥补能力短板与结构缺陷

针对人才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短

板,需“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双管齐下,构建适配人工智能赋能需求的人才支撑体系。其一,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政府部门应联合高校、科研机构、技术企业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法治”专项人才培养项目,开设“算法技术+政府治理+法律规范”等融合课程,培养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熟悉政府工作流程与法治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制定人才引进激励政策,通过薪酬补贴、职业发展通道优化等措施,吸引社会各界的技术专家、法律人才加入政府人工智能应用团队,填补内部人才缺口。此外,建立“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邀请企业技术专家、高校学者担任政府人工智能项目顾问,为技术应用提供专业支持,促进人才资源跨领域流动。其二,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技术应用能力与治理理念。针对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人工智能系统操作培训,编写通俗易懂的操作手册,开发模拟训练平台,帮助基层人员快速掌握智能政务平台、市场监管系统等工具的使用方法;针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组织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培训,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引导其树立“技术赋能+法治引领”的治理理念,推动从“技术工具使用”向“治理模式创新”转变。同时,建立技术应用考核机制,将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能力、风险识别能力纳入工作人员绩效评估,激励其主动提升技术素养,确保人才能力与人工智能赋能需求相匹配,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周维栋,周佑勇.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23(10):71-80.
- [2] 孙全胜.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J].河南社会科学,2024(4):94-105.
- [3] 王金刚,董亚楠.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挑战与法律规制[J].天津法学,2025(2):92-103.
- [4] 周生虎,王义保.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5w1h”分析[J].领导科学,2024(1):127-132.
- [5] 解志勇.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的四个面向及其实现[J].比较法研究,2023(1):1-18.
- [6] 马长山.数字法治政府的机制再造[J].政治与法律,2022(11):17-34.
- [7] 王静,张红.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路径——基于DeepSeek在数字行政中应用场景的分析[J].中外法学,2025(3):625-643.
- [8] 张富利.数字法治政府的治理效能悖论与破解之道[J].河北法学,2025(6):130-146.
- [9] 孟星宇.数字法治政府的概念融合与路径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24(6):169-178.

责任编辑:马俊

十月革命后列宁农民主体性思想的三维探析

梁玉锦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10)

[摘要]农民主体性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十月革命后列宁构建了农民主体性的三维体系。政治维度赋予农民土地支配权,通过苏维埃民主制度和阶级区分策略保障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经济维度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以粮食税制激活其经济主体性,并发展合作社让农民学习经济自治;文化维度则通过扫盲运动、平等的城乡互动与合作社实践引导农民内化集体主义精神、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三者辩证统一,为落后国家唤醒农民主体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镜鉴,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农民主体性 政治主体地位 新经济政策 文化改造

列宁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之一,持续关注并深刻思考着农民问题。他关于农民主体性的思想,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也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农民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主体地位的确立。陈晓莉、吴海燕认为,只有赋予农民充分的主体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彰显出来^[1]。其次,自主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核心特征,表

现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支配能力。王国敏、邓建华提出,农民主体性是“自主性、能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2]。最后,主体意识是农民主体性的精神内核,涵盖对自身角色的认同与发展诉求的自觉。王春光认为农民需要足够的反思能力和主动性,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文化的自主选择权^[3]。

农民主体性的本质是农民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上实现自主决策、能动参与和价值创造的能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校外实践教学社会协同机制研究”(立项编号:22VSZ154)。

收稿日期:2025-07-20

作者简介:梁玉锦,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政治上打破“被代表”的被动状态,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并管理社会事务,并与其他社会群体及组织共同构建良好的互动平台;经济上拥有对土地、生产与分配的主导权,自觉参与生产劳动并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受益者;文化方面掌握文化选择权和接受权,在具备基本认知能力的基础上,理解、认同并内化先进的意识形态,成为自觉的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

国内学界对列宁农民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丰富成果,但聚焦列宁农民主体性思想进行探讨的成果不多。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对十月革命后列宁农民主体性思想进行分析,揭示列宁农民主体性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期望以此深化对列宁思想体系的理解,且为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构建农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保障体系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农民深陷多重压迫。首先,土地的高度垄断使农民沦为地主的依附者。超过 4/5 的农户因高昂赎金与地租挣扎于生存边缘,基本生存难以保障,政治主体性就更无从谈起。其次,无论是沙皇专制还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时期,农民都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体系之外,利益诉求遭到忽视与压制。最后,农村内部阶级分化严重,富农与地主结盟剥削并打压贫农,限制其主体性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当务之急是通过根本性制度变革打破封建枷锁,确立农民作为苏维埃政权根基的政治主体地位,也为后续经济与文化改革奠定政治基础。

(一) 土地支配权奠定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经济根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8} 列

宁深刻认识到,基本的经济权利是实现政治主体性的前提。由于农民生计与土地紧密相连,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成为其核心经济权利。解决土地问题,成为确立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关键步骤。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提出:“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5]115} 这一原则在《土地法令》中得到贯彻:“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6]18}。

该法令不仅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更将土地支配权直接交予农民自己组成的苏维埃组织。农民从地主的依附者转变为土地的直接管理者与受益者,通过乡土地委员会等机构参与土地分配、生产规划与地方公共事务。按照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客观规律的逻辑,农民经济地位的转变,为农民从被动的政治客体跃升为积极的政治主体铺设了坚实的物质通道。这场土地改革既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经济基础,又在苏维埃国家框架内重新定义了农民作为主人的政治主体性,从而为新生政权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二) 基层民主实践是确立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关键场域

土地赋权为农民主体性的实现奠定了经济基础,而苏维埃民主制度则提供了政治实践场域。列宁强调要由群众“从下面发挥主动性”^{[5]270} 来参与国家生活,不要“来自上面的‘监视’,不要官吏”^{[5]270},即主张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

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农民真正获得了政治权利和主体地位。农民借选举权参与基层治理,既打破官僚权力垄断,成为公共事

务参与者,也培育了主人翁意识与治理能力;还通过乡、县苏维埃管理土地分配等事务,监督地方行政,以“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7]84}掌握罢免权,实际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维护自身主体地位。

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同,苏维埃民主会“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8]248}。农民不仅享有“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8]250}的自由和推选本阶级的人管理国家的选举自由,还能够支配土地、印刷所等关键资源。苏维埃政权不仅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渠道,更赋予其行使主体权利的物质与制度保障。广大农民通过亲身参与政治生活接受政治教育,真正成为“学习管理”并“开始管理”的能动主体,这正是农民政治主体性确立与深化的鲜活实践。

(三) 阶级区分政策是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重要保障

列宁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应依靠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而“不包括剥削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9]67}。这清晰地划定了政治主体性的边界,剥夺了剥削阶层的政治参与权,并直接指向农村的现实权力斗争。

事实上,农村内部的阶级压迫正是农民主体性实现的主要障碍。若不打破这种压迫,即使土地改革赋予贫农经济权利,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权仍将被富农架空,主体性也会流于形式。为此,列宁主张“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9]184},并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参与机制,将贫农从治理对象提升为政权建设的真正主人,为贫农自主行使政治权利、表达自身意志扫清障碍。在组织层面,要建立农村党支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并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

工会,使农村无产阶级构筑起独立的政治力量,确保其在基层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对混入政权、侵蚀农民主体性的异己分子保持高度警惕,毫不留情地把打着共产党员旗号的官僚主义者驱除出去,并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7]15},从而确保苏维埃政权代表贫农利益,在实践中巩固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

列宁的政策在短期内成效显著。《土地法令》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破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状态;苏维埃组织广泛建立,使农民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强支柱;通过选举、监督与罢免机制,农民切实参与地方与国家治理,成为行使权利的政治主体。“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7]156}这些成就在制度与实践的全面确立了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推动农民实现从封建依附者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主体的转变。

二、激活农民自主性的经济调适机制

列宁确立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战略在革命胜利初期成效显著,但若无法满足农民基本的经济需求,政治赋权将难以为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以强制征收农民全部余粮维持城市与军队供应,导致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政治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却掉以轻心”^{[10]367}，“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0]51}俄国很快转向更加务实的新经济政策,这也体现了对农民经济主体性的尊重。

(一) 土地自主经营是实现农民经济主体性的基础

列宁曾在国内战争时期推行共耕制,试图以土地、农具、牲畜的全面公有化和统一

经营取代个体经济,但遭到农民抵制。列宁认识到,只要小农存在,政策就须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要尊重其个体经营意愿,保障其自由耕种土地和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

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对土地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1921年,俄共(布)十一大确定了巩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给农村居民选择土地使用形式自由等原则。^{[11]139}1922年的《土地法典》进一步落实了这些原则,该法典规定巩固土地国有化,全体人民都可通过合作社或独立形式行使以经营农业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并重申土地上一切建筑物、作物等财产归使用者所有。这就巩固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为稳定农业生产奠定了法律基础^{[12]66-68}。

土地制度的松绑赋予农民两项关键权利,即自主选择土地使用形式和自主决策生产活动的权利。农民可依据家庭劳动力情况、市场行情和土地条件自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耕作方式、掌握劳动成果。这种对自主决策权和劳动支配权的制度确认,消除了农民对国家或集体随意干预生产的顾虑,激发其对土地长期投入的意愿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成为唤醒和确立农民经济主体性的基础。

(二) 粮食税制是农民经济主体性的关键支撑

余粮收集制剥夺了农民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强制征收,重新确立了农民对剩余产品的支配主体地位。列宁认为,这一让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10]313},是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必需。

粮食税实施后,国家仅征收必需的粮食,其余的用工业品去交换,这使得农民得以用市场来实践其经济主体性。其一,农民

可自主支配固定税额之外的粮食,确立了其对劳动成果的最终控制权;其二,国家允许甚至鼓励农民通过市场“流转”剩余农产品,使农民成为能议价的独立市场主体,并且国家以工业品参与交换,保障农民合理收益。这些权利共同构筑起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的能力。

流转对于当时的俄国具有积极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10]232}并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强调应坚决发展流转,但需设定可控的边界,在工农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10]219},故而苏维埃政权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也为农民主体性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过程中,列宁特别重视发挥地方首创精神,要求各地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10]223}推动工农业产品流转。这些措施使农民成为经济活动的自主决策者,极大释放了其劳动生产能力。

(三) 合作社是培育农民经济主体性的实践基地

列宁高度重视合作社在培育农民经济主体性中的价值,但其合作化路径与强制集体化截然不同,遵循着自愿联合与实践教育两大原则,使农民通过自主协作成长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者。

自愿性是合作社的根基。任何强制推行都会扼杀农民的主体能动性。列宁指出:“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7]191}必须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只有在其亲身体验到联合带来的效率提升、风险抵御及市场优势后,才会真心认同并参与,这样发挥农民自主性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

合作社是农民学习经济自治的实践学校,千百万农业工人“在这个组织中学会逐

步自己解决自己的一切事情”^{[7]22}。通过民主程序,农民共同行使生产自主权、实践“多劳多得”原则的收益分配权、管理土地和农具等集体资源的资源管理权并以集体力量进行统购统销、应对市场波动。国家提供贷款、技术等支持农民自主能力的成长,但不干预内部管理,列宁强调,“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13]368-369}这种支持是为了降低合作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最终巩固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其决策能力。

列宁的经济调适机制通过土地制度松绑、市场激活、合作社实践的三维互动,使农民逐步成长为具有经济理性和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义新型主体,在社会主义过渡期切实塑造和巩固了农民的经济主体性。这不仅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纠正,更是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的深化,政治赋权只有扎根于经济自主的沃土,才能培育出真正具有历史创造力的主体力量。

三、重塑农民主体意识的文化改造工程

赋予农民经济自主权和政治参与权是培育其主体性的基础,但若不能同步改造其文化心理、培育社会主义主体意识,新生政权将缺乏自觉的精神根基。俄国农村面临多重文化困境:高文盲率使农民无法理性认识自身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目标;城乡文化隔阂阻碍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思维与社会化生产、集体主义观念格格不入。因此,必须通过系统性的教育与实践,重塑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

(一) 文化启蒙奠定农民主体意识觉醒的认知基础

列宁将实现文化革命视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而其首要任务是扫除文盲。

当时俄国农村文盲率超过 80%,列宁指出,“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13]368}因此,扫盲不仅是一项教育任务,更是政治使命,是农民文化主体性觉醒的先决条件。

基于此,列宁 1919 年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法令,强制 8 至 50 岁公民接受识字教育,内容涵盖读写算及日常事务处理,为行使文化选择权和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奠定基础。同时,政府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讲习所等多元化教育载体,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宣传层面,要求报纸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8]93},将农民视为新文化的创造主体进行宣扬;学校则“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7]87},培育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主体。列宁还高度重视教师作为农民教育主体的作用,要求把教师地位提高到“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13]362},并使财政资金使用向基础教育倾斜,激发教师投身农民启蒙的热情。知识启蒙使农民能够理性认识自身地位与社会变革,是获得重构自身命运的主体力量的基础。

(二) 城乡平等互动是增强农民主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单向的城市文化灌输只会加剧城乡对立、扼杀农民主体性。列宁主张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接受规律,城市工人应成为农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但并不是说“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13]363},而应建立城乡“友好互助形式”^{[13]363}的交往。在具体实践中,工人团体应从农民实际需求如扫盲、农业技术推广等切入,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渗透集体协作理念与阶级意识,

尊重农村文化传统,避免强行割裂农民的生活经验,允许其在参与公共事务的实践中逐步理解和接受新价值观。

这种基于平等尊重的文化互动是对城乡关系的重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向农村输出的是“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13]364},苏维埃政权则通过有计划的支援,给予农村“相反的东西”。通过将“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13]364},工人支部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满足兄弟支部的文化需求,党组织、工会等团体成为向农村稳定输送文化资源的渠道,同时要尽量防止其官僚主义化,避免工人团体异化为新的文化权威,保障农民在互动中的接受权与参与权。由此,城乡平等互动成为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目标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三) 合作社是孕育农民主体意识的实践平台

合作社不仅是经济组织,更是重塑农民文化心理和主体意识的实践平台。列宁认为完全合作化本身就包含农民文化水平的问题。一方面,农民需具备“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13]368},即识字、计算和市场理性能力,才能摆脱“蒙昧的买卖人”状态,成为掌握现代经济知识和技能的“文明商人”,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另一方面,合作社的日常运作本身就是最有效的“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13]371},它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7]88}让农民实现自我启蒙与主体性锻造。农民通过民主管理学习集体决策,体验民主程序与集体意志的形成;通过共同核算理解公平原则,在共同记账、核算成本、协商收益分配方案中实践“多劳多得”原则;在市场中以合作社的集体力量进行统购统销、价格谈判,亲身体验

协作带来的市场优势。农民在实践中直面并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7]88},逐步内化集体主义价值。

正是在合作社这个社会主义实践学校中,农民通过处理具体的公共事务,逐渐跳出小生产者的狭隘视野,摆脱“小农意识”的枷锁,成长为能够自主管理集体事务、自觉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目标并为之奋斗的文化主体。因此可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13]371}。

列宁时期的文化改造工程效果明显。至1925年,全国9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由1920年的31.9%上升至50%以上,数百万农民首次掌握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文化工具;城乡支部结对机制初步搭建了交流桥梁,工人以技术支援、识字班等形式进入农村,不断消解文化隔阂;在合作社实践中,部分农民开始理解并接受协作理念,主体意识在具体事务中萌芽。列宁也认识到,改造小农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10]53},文化主体性要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缓慢培育。

四、结语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民主体性的探索,构建了政治赋权、经济激活、文化重塑相统一的三维体系。政治维度通过土地国有化与苏维埃民主制度,打破封建依附关系,使农民成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经济维度赋予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与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衔接;文化维度则借助扫盲、城乡互动与合作社实践,逐步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归属感,塑造新型文化主体。三者互为支撑、相互促进、辩证统一。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重温列宁的思想遗产,可为在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中激活农民主体性提供有益启示。治理层面,应深化村民自治实践,通过完善村民议事会等协商平台,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等重大事项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还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督问责平台,提升村务透明度,方便外出务工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使乡村基层民主落到实处,保障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经济层面,关键在深化农村“三权分置”改革,着力破除承包权流转和经营权抵押的梗阻,以此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充沛资金。同时加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重点扶持农民主导的专业合作社,提升统销统购和加工营销能力;在电商、物流等领域提供精准支持,助力农民掌握现代经营技能,成为理性的市场主体。

主体意识层面,既要传承优秀农耕文化,使农民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也要开展符合农民需要的教育培训来提升农民的认知水平,避免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被动与盲从。通过合作社、乡风评议等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治理,使农民在理性参与中增强价值认同。此外,应建立城乡互哺机制,推动人才、技术等下乡,但须注意要始终以农民需求为导向,避免外部力量代替农民决策。

农民主体性的培育是一个多方协同的长期过程。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以尊重农民意愿为本、以制度创新为基、以文化认同为魂,在治理创新、市场赋能、主体意识培育中持续夯实农民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 [1] 陈晓莉,吴海燕.增权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主体性重塑[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6):26-33.
- [2] 王国敏,邓建华.重塑农民主体性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J].现代经济探讨,2010(9):64-68.
- [3] 王春光.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8(1):31-40.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12] 顾树森.苏俄新法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13]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马俊

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构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

魏志达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整合监督力量构想是列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权力运行与监督的内在要求。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破解党政监督职能碎片化、官僚主义滋生等现实难题,列宁立足无产阶级专政本质要求,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实践思维三大科学思维方式为方法论支撑,形成整合监督力量的科学构想,其核心指向是通过党政监督机构功能融合优化体系架构、借助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辩证统一凝聚监督合力、依托实践导向的制度改革提升监督实效,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内涵,也为苏维埃政权巩固与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关键制度设计思路。同时,这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优化监督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列宁 科学思维方式 系统思维 辩证思维 实践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1]。监督制度的本质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而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能够避免运动式、碎片化的监督,形成系统性的威慑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如何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深刻回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的构想,其核

心是建立一个高效、统一、有权威的监督体系,这不仅是列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蕴含了丰富的科学思维方式。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合署办公,与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的构想高度契合。因而,通过研究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构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更加深刻地领悟系统思

基金项目: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研究”(立项编号:FJ2024XZB063)。

收稿日期:2025-07-21

作者简介:魏志达,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维、辩证思维、实践思维等在治国理政中的具体运用和巨大价值,同时对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引与方法论工具作用。

一、系统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党政监督机构功能整合

系统思维方式为列宁实现党政监督机构功能整合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引,是破解机构职能碎片化、提升监督效能的关键。

(一) 以整体性思维引领机构设置与职能融合

以整体性思维引领机构设置与职能融合,是列宁系统思维方式在党政监督体系构建中的重要运用,其本质在于打破党政监督机关的条块分割,通过机构间的有机整合与职能的协同,实现监督效能的整体跃升。列宁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2]378},并主张“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2]378},这一构想并非基于单一机关的功能优化,而是从整个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需求出发,因为“只有内外联动、形成合力,才能保证监督工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3]。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具备政治方向把控与党内监督的核心优势,工农检查院则拥有覆盖“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2]391}的行政监督基础,二者的结合能够消除党政监督的壁垒,避免出现监督盲区或职能重叠的碎片化问题,使得监督能够覆盖从政治引领到具体执行的全过程。

在机构设置层面,整体性思维体现为对监督要素的统筹配置与结构优化。列宁提

出“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 75—100 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2]378},且要求其“经过党的资格审查”^{[2]378},同时“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 300—400 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2]378}。这一机构设置逻辑是列宁从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需求出发即选拔工农出身的中央监察委员,是为了弥补党内监督可能存在的脱离工农群众问题,确保监督的广泛性与代表性;精简工农检查院职员并强化专业考查,是为了提升行政监督的精准性与专业性,避免机关工作人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二者实现了在机构设置上的互补,共同服务于覆盖所有国家机关的整体监督目标,彰显了系统思维对监督要素配置的整体性把控。

在职能融合层面,整体性思维表现为对党政监督职能的协同重构。列宁指出,工农检查院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2]391},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监督机关,承担着确保监督方向与党的宗旨一致的职责,二者融合后,职能上实现政治引领与行政监督的深度耦合。中央监察委员会从党的角度为监督工作划定政治边界,防止监督偏离维护工农国家利益的核心目标;工农检查院则依托其对苏维埃国家机关运作的熟悉,将政治监督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检查、指导行动,如“检查某一人民委员部、处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等等机关的工作是否正确”^{[2]360}“检查执行情况”^{[2]360}等。列宁以外交人民委员部实现党政机关灵活结合带来极大好处为例,论证这一融合并非“不可容许的东西”^{[2]390},而是适用于所有国家机关的普遍原则。因为对活动范围广、活动方式需灵活的监督机关而言,只有打破党政壁垒,才能避免职能碎片化导致的监督乏力,实现对所

有国家机关无例外监督的整体效能。

此外,整体性思维还体现在对监督体系与国家治理整体目标的衔接上。列宁指出,这一机构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4]261},其根本逻辑在于党政监督体系并非独立存在的局部系统,而是服务于工农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里都有官僚主义,若在监督体制上二者各自为政,不仅难以整治官僚主义,还可能因监督标准不一、信息不通导致治理内耗。而通过整体性整合,监督体系能够形成统一的监督标准、畅通的信息渠道,将反对官僚主义、确保国家机关正确履职的局部目标,融入巩固工农政权、推动苏维埃国家建设的整体目标中,使监督工作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而非孤立的管控手段。这一从国家治理整体出发的机构与职能设计,正是列宁系统思维方式的深层运用,确保了党政监督体系始终与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整体需求同频共振。

(二) 以关联性思维优化人员结构与实现功能互补

以关联性思维优化人员结构与实现功能互补,是列宁系统思维方式在党政监督机构人员配置中的关键实践,其在于把握监督体系内不同身份、层级、特质人员的内在联系,通过结构化配置使各群体的功能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协同关系,从而提升监督机构的整体效能。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存在“共产党员局限在领导者的小圈子内,不敢或不善于吸收足够数量的非党人员参加工作”^{[4]272}的缺陷,这一问题本质是人员结构关联性缺失导致的功能失衡,即俄共(布)党员虽具备领导经验与政治判断力,但长期局限于小圈子易产生脱离基层、固化思维的弊端,而“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不少有

才干而又忠实的非党人员”^{[4]272},其具备的基层实践经验、专业能力与朴素的工农立场,恰好能弥补党员群体的局限。基于此,列宁提出“把这些人安插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同时由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4]272},同时“非党人员也要监督党员”^{[4]272},并“吸收一批批经过考验而证明其忠诚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查院”^{[4]272-273},这一人员配置逻辑正是关联性思维的体现。列宁通过党员与非党人员的双向关联,使得党员的政治引领与非党人员的实践洞察形成互补,既避免非党人员因缺乏方向指引导致工作偏离,又防止党员因脱离工农群众导致监督失效,使两类人员的功能在关联中实现协同。

在中央委员会人员结构优化中,关联性思维进一步体现为实现不同层级、特质人员的功能互补。列宁主张“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2]345},并强调“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2]345},且这些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2]346}。列宁的这一构想并非简单扩大人员规模,而是基于中央委员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联性设计,即原有中央委员多具备长期苏维埃工作经验,熟悉政策制定与领导流程,但受到旧机关传统与成见影响,存在革新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来自基层、更接近普通工农的工人中央委员,虽缺乏高层工作经验,却拥有未被旧体制束缚的革新意识与对基层机关弊端的直观认知。二者的关联性配置形成功能互补,原有中央委员为工人中央委员提供政策理解与工作方法指导,确保其监督与革新工作不偏离方向;工人中央委员则以基层视角为原有中央委员提供

“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2]345}的实践依据,破解旧机关的积弊。列宁明确指出,工人中央委员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2]346}且“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2]346},正是对这一关联性带来的功能互补效果的预判,稳定性源于原有中央委员的经验支撑,革新力源于工人中央委员的实践洞察,二者通过“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2]346},从而将各自优势转化为中央委员会的整体效能。

(三) 以结构性思维重塑工作流程与信息传递方法

以结构性思维重塑工作流程与信息传递方法,是列宁系统思维方式在党政监督机构功能整合中的深层实践,其通过对工作环节的层级化分工、信息传递的规范化设计,构建分工明确、衔接顺畅、反馈及时的监督运行体系,使监督流程与信息流动形成相互支撑的环节。列宁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分一下工”^{[2]380},明确“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2]380}“学习理论和研究科学组织劳动”^{[2]380}“实际参加监督和改善从上层国家机构到基层地方机构的工作”^{[2]380}等不同职能分工,这一分工正是基于监督系统的整体目标对工作流程进行的结构性拆分,出席政治局会议侧重决策监督,学习理论侧重能力支撑,基层监督侧重实践落地,三者流程上形成决策监督、能力保障与实践验证的衔接,既避免因职能混淆导致的工作冗余,又通过各环节的相互赋能确保监督流程的完整性,体现系统思维对工作流程结构化拆分与协同化整合的双重要求。

在信息传递方面,列宁强调“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2]380},这一规定构建了常态传递与应急传递并行的信息传递要求。从系统思维方式看,这一结构设计既保障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与完整性,即提前24小时送达使监察委员有充足时间研判文件、准备质询,避免因信息滞后导致监督流于形式,又通过特别程序的补充设计,应对信息传递中的突发情况,确保监督系统对紧急事务的快速响应。同时,列宁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2]388},并“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2]389},这进一步将信息传递纳入监督流程范围,文件检查不仅是对信息内容的监督,更是对信息传递规范性的校准,通过检查办文制度可及时发现信息传递中的堵点、断点,从而优化信息传递的结构设计,使信息流动与监督流程形成传递与检查的动态适配,避免因信息传递不畅导致监督系统“失灵”。

此外,结构性思维的深层价值还体现在工作流程与信息传递的协同配合。列宁认为,改革后“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2]380},其本质是通过流程与信息结构性耦合,提升监督系统的整体效能。一方面,层级化的工作分工为信息传递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基层监督环节获取的问题信息需向上传递至决策监督环节,为政治局会议提供监督依据;决策监督环节的意见反馈需向下传递至基层监督环节,指导实践改进,形成信息的双向流动。另一方面,规范化的信息传递为工作流程提供了

精准的信息支撑。监察委员通过提前获取的文件信息,可在政治局会议中提出针对性质询,使决策监督环节更具针对性;通过学习理论获取的知识信息,可优化基层监督的方法策略,使实践落地环节更具科学性。这一工作流程与信息传递的协同关系,使监督系统的信息传递与工作流程形成相互嵌入的有机整体,既解决了传统监督中“信息孤岛”与“流程碎片化”的问题,又通过结构性重塑增强了监督系统的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正如列宁所言“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2]380},最终实现党政监督机构功能的优化升级。

二、辩证思维方式贯穿于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统一中

辩证思维以把握对立统一为核心方法论,是理解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内在统一性的关键工具。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功能分野与价值耦合中形成了互动和统一。

(一) 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辩证统一

辩证思维方式既承认矛盾双方的功能分野,又揭示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价值耦合。在党的领导与群众主体作用的关系维度中,这一内在统一体现为:党的领导为工农群众监督提供方向引领与组织保障,工农群众主体作用为党的领导注入基层活力与实践支撑,二者在互动和统一中共同服务于苏维埃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

从差异性维度看,党的领导与群众主体作用存在明确的功能定位差异,这一差异构成辩证关系的逻辑起点。列宁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存在于‘过渡时期’,还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必须坚持共产党对工农国家各

项事业的领导”^[5],党的领导体现为引领性统筹的角色,其功能聚焦于制度设计、秩序规范与能力赋能。列宁提出“地方上应当编造名册(依据宪法)”^{[6]79}“确定逐步吸收、轮流替换等原则”^{[6]80}“拟就详细的指示”^{[6]80},以及要求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依照特别指示“吸收工农检查机构的代表(或代表小组)参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各项工作”^{[6]80},这些要求本质是党通过制定规则、提供指导,为工农群众参与划定合理边界、弥补能力短板。而工农群众主体作用则体现为基础性参与的角色,其功能聚焦于监督实践的落地与基层诉求的传递。根据参与水平差异,工农群众可充当“‘目击者’、证人、见证人或见习者”^{[6]80}或“享有全权(或几乎全部权利)”^{[6]80}的监督者,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更被授权“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7]28},这一参与是以主体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监督、机构检查等具体事务,形成与党的领导在功能上的互补。

从统一性维度看,党的领导为群众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消解工农群众参与的自发性局限。辩证思维强调矛盾一方对另一方的促进作用,党的领导正是通过制度供给与能力培育,将工农群众的分散监督力量转化为系统监督效能。列宁指出:“为了不因吸收大批人参加而发生混乱,应当确定逐步吸收、轮流替换等原则”^{[6]80}。这一制度设计避免了工农群众因无序参与导致的效率损耗,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官员“在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上讲大课”^{[6]80}“说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原则和工作方法”^{[6]80},则通过理论普及与方法传授,解决了工农群众因理论水平不高可能面临的监督能力不足问题。此外,列宁提出“通过党和工会来逐步开展对劳动者参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工作情况的检

查”^[680],进一步通过党的组织力量跟踪了解参与效果,确保工农群众主体作用不偏离工农检查的核心目标,使工农群众参与从自发行为升华到有序实践。

与此同时,群众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为党的领导注入基层穿透力,构成辩证统一的另一重维度。党的领导并非脱离工农群众的抽象存在,其有效性需通过工农群众的认同与参与来检验和强化。列宁明确将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定位为“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728]的机构,工农群众通过工农检查参与监督,既能将基层对产品、商品、仓库等领域的监督诉求直接传递至国家机关,又能为党输送优秀的人才,使党的领导更贴合基层实际、更具群众基础。尤其列宁提出“逐步地请各地农民(必须是非党农民)参加中央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680],更让工农群众参与突破地域与层级限制,成为党联结基层的重要纽带,使党的领导决策更能反映工农群众意愿,进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

(二) 批判群众自发倾向与引导群众政治觉悟的辩证统一

从辩证思维方式看,工农群众自发倾向具有客观必然性与潜在局限性这二重属性,对其批判并非否定工农群众主体价值,而是正视历史条件下工农群众意识的阶段性特征。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转向建设时期面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834]的现实困境,工农检察院“过去所以开动不起来,是因为优秀的工人都派到前线去了,而农民群众限于文化水平又不能大量提供工作人员”^[834]。这一文化水平与建设、监督任务的适配性矛盾,决定了工农群众自发倾向

易呈现两重性:一方面,工农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蕴含健康因素,这是工农群众监督意识的自然萌发;另一方面,自发倾向易受认知局限影响,表现为对苏维埃建设事业“既不理解,也不相信”^[835]的抵触心理,或在监督中因缺乏系统认知而陷入“为反对而反对”^[835]的无序状态,这一消极面若不加以批判纠正,将阻碍党和苏维埃国家事业推进,因而对工农群众自发倾向的批判,本质是对其非理性、碎片化特征的理性规制,而非否定工农群众的监督热情和参与意愿。

引导群众政治觉悟的过程,是将工农群众自发倾向中的健康因素转化为自觉行动、消解消极面的辩证提升过程,其在于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搭建工农群众实践与理论认知的桥梁。列宁指出,党需要“使工农检察院不仅在法令意义上存在,而且能够真正吸收工人群众参加”^[835],这一主张揭示了引导的关键路径,即通过让工农群众参与工农检察院工作等具体监督实践,在解决“一心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向建设和组织工作”^[834]的转型难题中,逐步理解党的路线方针。面对工农群众对苏维埃建设事业的生疏与不信任,引导并非强制说服,而是以“极端审慎的态度”^[835]对待不同观点,甚至“作这样那样的让步,宁多勿少”^[835],通过包容合理诉求、化解对立情绪,使工农群众在感知自身利益与党的事业一致性的过程中,实现政治觉悟的提升,让工农群众监督不再停留于零散批判,而成为推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

批判群众自发倾向与引导群众政治觉悟在辩证统一中共同服务于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协同。批判是引导的前提,若回避工农群众自发倾向中的消极面,引导将沦为无的放矢;引导是批判的目的,若仅批判

而不注重群众的政治觉悟提升,将割裂党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列宁既主张“尽快地粉碎所谓的反对派路线”^{[8]35}以遏制争吵、互骂、斗气的无序、自发倾向,又强调正视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其深层逻辑正在于通过批判划清是非边界,通过引导激活工农群众主体性,最终实现“全党同心协力”^{[8]35}的目标。在苏俄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群众自发倾向与引导群众政治觉悟的辩证统一,既避免了因放任自发倾向导致的组织涣散,又防止了因过度批判引发的工农群众疏离,使党的领导与工农群众监督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合力,为苏维埃政权巩固与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三) 正视群众当下文化局限与坚信群众历史创造力的辩证统一

“列宁的人民文化观打破了传统的精英型文化,建构起新式的大众型文化,实现了文化观念与实践的革命性转变。”^[9]从辩证思维方式看,列宁正视工农群众当下文化局限是对现实矛盾的理性认知,并非否定工农群众主体价值,而是把握工农群众参与监督和建设的客观前提。列宁明确指出,工农检察院“成立将近一年了,但是它作为培养管理国家能力的学校,目前做得还很少”^{[8]49},其深层原因在于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与国家建设、监督任务的适配性矛盾。工农群众虽有参与意愿,但“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2]383},且苏维埃国家机关长期“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2]382},导致工农群众即便参与工农检察院工作,也难以快速胜任管理国家、反官僚主义的复杂任务。列宁对文化局限的正视,既承认了“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2]382}的历史遗留问题,也直面了革命年代“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2]383}下工农群众文化建设

滞后于制度变革的现实,是辩证思维中尊重客观规律的体现。

坚信群众历史创造力是列宁对工农群众发展潜力的辩证把握,并非忽视文化局限,而是看到工农群众在实践锻炼中突破局限的可能性。列宁提出“使几十万、几百万劳动者通过工农检察院受到锻炼,学会管理国家”^{[8]48},并期待其“代替几十万资产阶级官僚”^{[8]48-49},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认可工农群众具有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创造历史的内在动力。尽管当下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有限,但革命时期“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2]383}的巨大变革,本身就是工农群众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而将工农检察院定位为“培养管理国家能力的学校”^{[8]49},正是通过实践激活工农群众创造力的关键路径,让工农群众在参与监督国家机关、反官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理解苏维埃社会制度精华、积累管理经验,实现从文化局限到能力胜任的飞跃。这一对工农群众创造力的坚信,是列宁辩证思维中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必然结果,既回避当下不足,又不否定工农群众未来的历史作用。

正视群众当下文化局限与坚信群众历史创造力在辩证统一中共同推动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协同发展。正视文化局限是为了更科学地激发创造力,列宁强调工农检察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2]382}“最好慢一些”^{[2]382},正是基于对文化局限的正视,避免因急躁冒进导致工农群众参与流于形式;而坚信创造力则为正视文化局限提供了方向指引,克服文化局限的最终目标是让工农群众成为管理国家、监督政权的主体力量。二者并非对立,而是苏俄现实基础与发展目标的辩证统一,即通过正视文化局限制定符合实际的培养策略,借

助实践锻炼释放工农群众的创造力,最终实现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提升与历史创造力发挥的协同并进、互相促进,为党的领导筑牢群众基础,为群众监督注入持久动力。

三、实践思维方式提升监督制度改革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实践思维方式为监督制度改革提供科学方法论支撑,其立足苏俄现实矛盾、聚焦实践效果的内核,在列宁探索苏俄监督制度建设中深度彰显。

(一) 以渐进式实践探索替代理想化制度构建

“列宁概括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实践,阐明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伟大革命的改良渐进行动方式的新思想新策略。”^[10]从实践思维方式看,列宁以渐进式实践探索替代理想化制度构建,本质是基于对苏俄监督制度建设现实条件的理性认知,摒弃脱离实际的“一步到位”思想,转向契合客观实际的动态调适路径。列宁明确指出,官僚主义与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4273],且“同这种弊病作斗争只有经过多年的顽强努力才能取得成效”^[4273],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理想化制度构建的局限性,即若忽视苏俄文化水平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等现实约束,仅凭借制度条文理想化设计,只会导致制度空转。实践思维方式要求从现实出发,承认监督制度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因而列宁强调“决不能灰心丧气,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恢复中断的工作”^[4273],通过渐进式实践探索,逐步适配苏俄现实条件,避免因急躁冒进陷入制度设计完美却无法落地实施的困境。

渐进式实践探索的核心在于以试验、比较与优化的实践逻辑,替代理想化制度的静态预设,通过多元方法的反复验证找到

适合苏俄现实的监督路径。列宁列举了改组工农检察院、吸收非党人员参与检查、司法追究、裁减与精选职员等多种办法,并强调“所有这些办法,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中所提出的一切措施,以及报刊上指出的一切方法,都应当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反复多次地加以试验、比较和研究”^[4274]。这一实践路径并非否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是拒绝将制度视为一劳永逸的终极方案,转而将每一种办法都作为实践样本。例如,针对工农检察院“没有丝毫威信”^[2385]“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2385]的现状,列宁提出“立即坚决冲破一般的职员编制标准”^[2385]“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察院的职员”^[2385],这一调整并非源于理想化构想,而是针对机关工作质量低下、人员素质不足等现实问题的回应。通过反复试验,既能筛选出贴合苏俄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的有效措施,又能避免因单一制度设计失误导致的整体失效,这鲜明体现了实践思维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核心要义。

这一取代的深层价值在于实现监督制度与现实条件的动态平衡,使制度效能渐进探索中逐步释放。理想化制度构建往往追求标准统一、覆盖全面的形式完美,却忽视不同阶段现实需求的差异性,而渐进式实践探索则以问题为导向,根据实践反馈灵活调整方向。列宁认为,“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对于这种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2385],并主张“在这里对数字要掌握得特别紧”^[2385],本质是优先解决机关质量低下、职员不称职等核心问题,而非追求人员数量的理想化扩张。通过这一先解决关键矛盾、再逐步完善体系的渐进路径,监督制度

能够在每一个实践阶段都与苏俄现实条件相适配,既避免了制度与实践的脱节,又能在反复探索中积累经验,为后续制度完善奠定实践基础,最终实现监督制度从形式存在到实效发挥的转变,彰显实践思维方式对制度建设的科学指导意义。

(二) 以实际工作成效作为检验和选拔人员的根本标准

以实际工作成效作为检验和选拔人员的根本标准,是破除监督机关形式化困境、锚定制度实践目标的关键要求。实践思维方式拒绝以人员数量、编制规格等形式指标评判监督队伍质量,而将能否实际问题作为核心标尺。列宁尖锐指出,工农检查院是“拥有约 12000 人的工作差、报酬低的机关”^{[2]186},且面临本位主义、职员水平很低、各部门内部倾轧等问题,“这一现象实质上是旧官僚体制重视规模扩张积弊的文化遗传”^[1],其根源正在于过往人员选拔脱离成效导向,即未聚焦“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2]186}的实践使命,导致机关规模庞大却工作水平低下,无法承担反官僚主义、教非党工农学会管理的实际任务。实践思维要求将工作成效置于选拔与检验的核心,正是为了改变重形式轻实效的情况,确保人员能力与监督制度的实践需求相适配,避免制度沦为仅因官衔存在却无实效的空壳。

以实际工作成效为根本标准的选拔与检验,体现了能力、实践与成效的内在统一。列宁为工农检查院职员设定的条件,均围绕能否产生监督实效展开。“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2]386}实质是基于过往实践表现而提供的担保,确保推荐对象具备可验证的工作能力;“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2]386}“通过有关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公制度等基础知识的考

试”^{[2]386},是对履职所需实践能力的检验,避免无能力者占位情况;“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2]386}则是对协同成效的保障,防止个体能力无法转化为整体监督效能。同时,列宁主张“留下六分之一的人员,而保留原薪水额的二分之一,即把薪水提高两倍”^{[2]186},通过精简与薪酬激励的结合,倒逼人员以出成效为目标,淘汰工作能力低下者,选拔“最优秀的、绝对忠诚而有才干的工作人员”^{[2]186},使选拔过程成为筛选实效贡献者的重要环节。

这一标准的深层实践价值,在于将人员选拔与监督制度的核心任务相联系,使人才选拔成为有效监督的前提。列宁强调,若不坚持成效标准,“就不能同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不能教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学会管理”^{[2]186},而这两大任务正是监督制度的实践要求。若仅以形式指标选拔,即便多次改组工农检查院,也只会陷入“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2]386}的无效循环,而唯有以实际工作成效为根本,才能逐步建成“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2]386},让人员选拔不再是孤立的人事操作,而成为激活监督制度实效性的关键路径。

(三) 以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为导向界定监督内容与监督效能

实践思维拒绝脱离现实矛盾的抽象批评,要求监督内容必须聚焦苏俄经济建设与苏维埃政权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列宁尖锐指出“批评没有内容”^{[8]36}的现实困境,即“在区的会议上批评涉及的都是一些小事,而关于工农检查院,连一句话也听不到”^{[8]36-37}“整个经济管理机器都要以最大的速度转动起来,但是,关于这点一句话都听不到,而互骂、斗气的事情却多得很”^{[8]37}。这种空泛批评本质是监督内容脱离苏俄实践需求的表现,既无法触及“官僚主义的脓疮”^{[14]25},也不能回应工厂管理、街区治理、消

费合作社运营等具体领域的问题。实践思维要求重构监督内容的界定逻辑,以是否解决苏俄实际问题为标尺,将监督重心转向“某个工厂有些什么经验,它们为驱逐某些官僚主义者做了些什么,某个街区的管理组织和消费合作社有什么经验”^{[8]37}等具体问题,使监督不再是形式化的言语交锋,而成为推动苏俄经济建设、反官僚主义的实践工具,正如列宁强调的,“真正的建设工作就是要运用批评,就是要注意批评的内容”^{[8]37},唯有紧扣苏俄具体现实问题,监督才能摆脱无的放矢的困境。

以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为导向界定监督效能,是实践思维以结果检验成效的直接体现。列宁指出,尽管官僚主义问题“在中央委员会中提出”^{[4]25}“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4]25}“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在更大的范围里提出”^{[4]25},但实效却未达预期,根源在于效能界定偏离苏俄实际问题解决。一方面,部分纲领对官僚主义的提法“至少是轻率的,往往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4]25},未触及工农群众不会通过工农检察院行使权利的具体障碍;另一方面,监督未聚焦消除冲突、改善经济等工农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导致“在那些叫喊反对官僚主义叫喊得最多的地方,往往也不会行使这种权利”^{[4]26}。实践思维方式要求,监督效能的界定必须以具体问题是否解决为核心标准。工农检察院的监督效能,要看是否帮助非党工农学会管理、是否驱逐了具体岗位的官僚主义者;经济领域的监督效能,要看是否优化了工厂运营、是否提升了消费合作社服务质量。这一效能界定逻辑,将监督从言语宣传转向行动实效,正如列宁强调的“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8]37}“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8]37}的实践要求。

这一导向的深层实践价值,在于使监督

内容与监督效能界定始终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巩固与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彰显实践思维方式强调服务现实需求的本质。列宁指出:“我们应当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样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就会取得成就,使我们在国际方面取得彻底的胜利”^{[8]37},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监督能切实解决“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改善自己的经济;为了消除冲突,他们既不需要警察的棍子,也不需要资本家制造的饥饿”^{[8]37}等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界定监督内容与监督效能,既能避免监督与实践脱节,又能通过解决工农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问题,增强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进而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克服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可见,这一界定方式使监督成为联结党的领导与工农群众实践的桥梁,让监督效能转化为苏俄经济建设成效与苏维埃政权凝聚力,是实践思维方式在监督制度改革中的生动运用。

参考文献:

-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N].人民日报,2023-02-01.
- [2]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魏志达,洪书源.列宁晚年关于构建监督合力模式的重大创新[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3):28-35.
- [4]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俞敏.列宁关于共产党长时期领导工农国家各项事业思想的形成及其重要内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3):73-83.

[6] 列宁全集:第 3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列宁全集:第 3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列宁全集:第 4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 代依晴,刘旺旺.列宁的人民文化观及其当代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5(1):

30-37.

[10] 奚广庆.列宁改良渐进革命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革命[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2):27-34.

[11] 魏志达.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3):11-20.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27 页)

激励机构提高员工薪酬待遇。探索建立“通州区养老服务之星”年度评选制度,每年选拔 50 名优秀从业者,颁发荣誉证书、给予物质奖励,并将获奖人员纳入通州区人才库,享受相关人才待遇。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经济与社会待遇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养老服务队伍。针对老年康复护理专业人才匮乏的情况,结合各医疗卫生单位空编空岗情况,每年拿出一部分岗位用于康复专业人才的招聘。坚持引才与引智相结合,积极采取聘请、兼职、讲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柔性引进康复专业人才。此外,积极推动通州中专等区内中职学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或与周边开设老年医学、康复护理等专业的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设立“通州区养老服务人才定向培养班”,实现“订单式”人才培养。二要健全在职培训体系。由政府牵头,联合专业培训机构与高校,建立养老服务人才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针对现有从业

人员,定期开展老年护理、康复技能、心理关怀等专业培训;对老年医学科等专业岗位人员,提供赴三甲医院进修、参加国际老年医学研讨会等深造、学习机会,提升其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3] 赵丽娅.京津冀协同创新助推廊坊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研
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3(1):216-217.

责任编辑:马俊

“科技创新与网络文明同频共振”等七则

科技创新与网络文明同频共振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

6月10日至11日,以“汇聚网络正能量 引领时代新风尚”为主题,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举行。这也是该“国字号”盛会首次走进长三角、首次走进中部地区。

缘何选择合肥?从这座城市科技创新与网络文明同频共振的发展脉络中,能够找到答案。

汇聚向“善”力量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网络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

合肥街头,身高1.1米的“气球妈妈”彭霞骑着挂满气球的三轮车,行驶在路上。从受助者到助人先锋,她用卖气球的微薄收入,10年间陆续资助了50多个孩子上学。这份坚守,也让彭霞在2024年入选“中国好人榜”。

“袖珍妈妈,比肩巨人”“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就是人间大爱”……彭霞自强不息、以善报世的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广泛赞誉。

精神的力量就像空气,一旦流动起来,就能成为风。善,早已深深融入合肥的城市血脉。

作为连续四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多年来,合肥持续深化“好人成名人”工程,加强先进典型网上宣传,办好“榜样”专栏,推进“我帮好人上首屏”等活动,涌现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马毛姐、全国道德模范陈陆、“时代楷模”邱军等一批先进典型。目前,全市15人入选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持续擦亮“好人合肥”品牌,合肥累计涌现“中国好人”205人,总数连续10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是许多卡车司机的感受。而合肥打造的“全国货车司机卡友地带互助救援”公益平台,让众多货车司机告别“孤行千里”。

2015年起,合肥依托货车司机互助交流社区“卡友地带”APP设立了互助专区,为平台货车司机搭建互帮互助平台,途中遇到意外事件,可以通过专区求助,运维人员会快速响应需求,引导附近司机前往帮忙,并依托全国地级市互助分部及县级互助支部线下分部,实施现场救援。

网络平台,让爱心有了便捷的表达出口。以互联网为纽带,社会各方充分链接、互动、融合,汇聚点滴善意。

从身边好人到云端志愿,从网络公益到指尖文明,合肥以良好道德风尚滋养网络空间,向善的力量在数字浪潮中奔涌不息。

激发向“新”动能

在合肥水务集团调度中心,一块巨大的电子屏上,数据实时跳动,显示着合肥城区超1万公里供水管网的运行状态。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供水管网上安装的漏失监测仪就像一个个“听诊器”,可以收集压力、流量等数据,通过人工智能精准定位隐蔽漏点。目前,合肥已投入300多台漏失监测仪,人工智能精准定位40多处隐蔽漏点,节水约56.1万吨。

而这里,仅是合肥数字化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的一隅。

互联网浪潮中,海量数据驱动着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合肥充分发挥科创优势,以“城市大脑”建设为牵引,通过构建全市逻辑统一的新一代政务云,打造集约高效的“城市中台”,加快数据资源融合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晚高峰的包公大道高架上,车流如织,秩序井然。依托“交通超脑”大数据分析,合肥优化了87

个拥堵点位信号灯配时,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近年来,合肥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造立体化、智能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市民出行创造高质量交通环境。

城市建设治理,需要更多市民的积极参与。合肥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逐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共建”的治理格局,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打开“数字城管”平台,市民刘洋上传了一张公共道路上机动车随意停放的照片,促使问题得到快速解决。2024年,“数字城管”平台处置各类城市管理问题180余万件。

让百姓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智慧城市才会更有温度、更加文明。在合肥市民政务服务中心,“人工智能政务导办数字人终端”支持1800多个事项的问答咨询和办事引导,“人工智能政务综窗助理”辅助窗口工作人员的收件时长平均缩短80%。

自2024年起,合肥整合48个部门的312个政务服务事项,上线36个“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截至今年5月底,累计办件量超27万件,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万物互联,科技赋能,正让合肥持续迸发新活力,展现新气象。

奋力向“上”攀登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招投标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达到业界熟练专家水平。

今年,合肥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设用于公共资源交易的“青天大模型”,以一个电梯类项目为突破口,完成全国首个人工智能类人评审项目,人工评委全票采纳人工智能专家打分,原需3.5小时的评审工作缩短至15分钟,实现效率跃升。

人工智能是合肥的重点产业之一,发展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去年以来,合肥开放多项场景机会,催生出智慧评标、智慧交通、数字政务等创新应用,也让网络文明建设有了具象化的实践载体。

推动网络文明,事关全局和长远。作为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举办地,北京、天津、厦门、成都、合肥不仅在网络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发展与经济实力也出类拔萃,为大会的成功举办提供有力支撑。

拿合肥来说,2024年规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收701亿元,同比增长24.7%。培育出科大讯飞等6家上市软件公司。此外,“芯屏汽合”已成为当地产业地标,拥有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及新型储能、新型显示、人工智能、智能家电(居)、高端装备等6个千亿级产业链。

产业向上,发展向前。2024年,合肥以13507.7亿元的GDP位居全国城市第十九位,比2023年再进1位。今年一季度,合肥以6.6%的GDP增速居全国27座万亿城市第二。

奋力向“上”攀登,硬实力转化为吸引力,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等相继扎根。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选址合肥,是肯定,也是对“再向前”的鼓励。

文明一座城,向上新力量。在日渐清朗的网络空间里,文明之花正粲然绽放。

(作者:吴焰、徐靖;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6月)

“稻米之乡”合肥变身科技高地

在合肥一个会议厅内,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令人惊叹的稻田美景。在其对面,则是4天内参观了十多个工厂的13名外国记者。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里,合肥通常被认为是稻米、茶叶和谷物之乡。但只用了15年时间,合肥及周边地区就吸引或催生了数万家高科技企业、研究中心和工厂,领域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无人出租车、机械臂、语音识别和量子通信等。

合肥政府3月宣布设立100亿元人民币基金,用于支持智能机器人产业,包括物流分拣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等。目标是要让各个受到扶持的高科技行业,能够建造一个产业链。

合肥大众电动汽车工厂是当地政府引以为豪的项目之一。40年前就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大众,现在面对的是燃油车式微和电动汽车带来的竞争:2024年其在华销量减少了8.3%。大众想要在合肥寻求实现发展,靠的是一座“自动化率达到96%”的巨大工厂,以及一个侧重紧凑型电动汽车的研发中心。

大众在合肥的工厂内,自动搬运车会根据地

面的二维码,将部件送到焊接机器人所在之处,随后 3D 扫描仪会进行精准检测以避免出现哪怕是最小的误差。

大众公司技术总监卢德格尔·吕尔曼说,大众深耕合肥主要是因为两个战略合作:“我们与科技公司‘地平线’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共同研发,以及我们和国轩高科在车用电池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采用新技术。从这种角度出发,合肥是一个理想场所。”

2023 年,合肥政府和大众开设“大众学院”,旨在让当地大学生熟悉现代化的汽车产业,并鼓励他们投身工程行业。

当地教育系统十分重视科学学科,这对合肥的转型发展起到很大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合肥。正是在这所大学成长起来的语音及语言处理专家刘庆峰创建了语音识别企业、即时翻译的佼佼者科大讯飞。科大讯飞的展厅接待了大量学生团体,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展示算法及其内部奥秘。如今,这家企业正支持一些声学领域小企业的研发。

2009 年,中国推出《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发展目标转向电动汽车。国轩高科在当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产业转型机遇,开始重点发展电动汽车电池。如今,国轩高科主要为电动汽车生产锂电池,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储能设备。

蔚来汽车则要感谢合肥政府的救助。2020 年,这家上海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濒临破产,合肥政府为其注资 70 亿元人民币,条件之一是蔚来要在合肥建厂。合肥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财政支持只是一个侧面,重要的是我们政府有能力非常快速地为企业服务。”

(作者:若尔当·普耶;来源:《参考消息》2025 年 6 月)

科技赋能,守护城市安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对于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模式,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近日走进安

徽合肥等地,实地探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的建设与运行情况。

从“看不见”到“管得住”

在合肥,一场关于城市生命线安全的革新正在悄然展开。当合肥跨入千万人口特大城市行列,城市生命线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运行压力。燃气、供水、桥梁、排水等维系城市运转的“血管”与“筋骨”,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面临老化与风险叠加的困境。以燃气管道为例,70%的燃气爆炸事故是由微小泄漏导致的,其中 60%发生在燃气管道之外的相邻空间。这些“看不见”的风险,如何应对?

“科技吹哨,系统响应。”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永用 8 个字概括了破局的关键。2013 年,合肥市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合肥院”),短短十余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平台——巨灾科学中心在清华合肥院建成。这里不仅有我国首套大型灾害耦合模拟实验装置,还建成了全世界首个全尺寸的城市燃气、供水、供热、桥梁、电力综合灾害实验平台。

2021 年 9 月,安徽省启动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一期)建设工作。如今,安徽省已初步构建“1+16”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监测运行体系,涵盖 17 万公里地下管网、1230 平方公里地上建构筑物,布设 18.7 万套前端感知设备,对 3.1 万公里地下管网及 325 座桥梁实施全天候监测。

数据显示,安徽省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一期建成运行以来,全省城市地下管网事故发生率降低了 60%,风险排查效率提升了 70%。

创新破解城市安全难题

安徽省的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是科技赋能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一个生动实践。从南淝河畔的古老石桥到纵横交错的地下管网,从繁华大道高架桥到延伸向县域的监测网络,安徽省的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一期、二期完工后,将构建起燃气、桥梁、供水、排水、热力、综合管廊、消防、水环境八大领域立体化监测网络,并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县全域监测覆盖,有效保障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

“安徽省三级以上预警事件平均响应时间降低至 7 分钟,处置时间 60 分钟。”安徽省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相关负责人李远疆表示,各类预警会

被分为三、二、一级,第一时间点对点分层推送到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应急部门,同步推送到辖区政府,联动处置预警信息。

在清华合肥院一楼,袁宏永向记者展示了学院的最新研发成果——只有拇指大的激光探测器。“传统的半导体、电化学、催化燃烧、红外探测器,敏感度也挺高,但是在地下高潮湿、高腐蚀的环境下,电磁信号受干扰严重,容易误报,而且寿命一般不超过3年。”袁宏永介绍。清华合肥院创新研发了基于反射光栅的激光芯片和非制冷激光器。这一创新将芯片和器件的良品率从不足50%提高到90%以上。“现在技术完全自主,芯片价格降低到60元左右,寿命达十年左右,一个家庭用的激光燃气探测器只需200多元。”袁宏永笑着说,“这为我们实施大面积的监测提供了基础。”

在清华合肥院的巨灾科学中心,28个实验平台持续为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的创新实验提供各种极端灾害的模拟场景。在水环境实验室,新一代精准捕捉微小渗漏的智能球技术取得突破,定位精度达正负1.5米,不停水即可完成检测。在先进材料实验室,150克森林消防灭火剂可让20升水的灭火效率提高3倍至5倍,为城市应对复合型灾害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在城市各个桥梁的关键点位,“数字哨兵”系统昼夜监测,位移、应变、温度、振动等每一个事关桥梁安全的监控数据实时传回省监管中心。

一个又一个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是这场城市生命线系统安全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而产学研成果的快速转化,更是将创新策源地培育成新质生产力的集聚高地。

截至目前,清华合肥院先后攻克建筑结构微元火灾探测技术、城市极端灾害预警预报系统、高性能激光传感器、阻燃变压器油、阻燃新能源汽车电池电解液等30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直接孵化出科技企业16家。

科技不断向前,产业持续壮大,由200多家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参与的安徽省城市安全与应急产业(技术)联盟已集聚起300多家重点企业,产业规模超500亿元,预计2025年产值将超千亿元。

让城市更具韧性更宜居

安徽省的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为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这

一模式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北京、天津、深圳、成都等100多个城市,类似的监测系统和应急响应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的安全性和韧性。

在合肥,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的二期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二期工程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监测范围,还增加了对燃气用户终端、瓶装液化气、水环境治理、消防、电梯、窨井盖、热力、综合管廊、轨道交通、城市照明等更多领域的监测和管理。通过这些努力,合肥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整体安全水平,为居民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在积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十四五”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补短板、强弱项、增效能的政策举措,系统化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更新改造。

在提升安全韧性方面,我国大力实施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建设改造各类市政管网50万公里,消除城市的易涝积水点4800个,同时有超过一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配套加装物联智能感知设备,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我国加快建设城市综合道路交通体系,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和污水管网补短板,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十四五”以来,我国建成城市道路56.4万公里,轨道交通里程1.1万公里,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促进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和绿色低碳发展,海绵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未来,随着更多城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发展,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将迈上新的台阶。通过科技赋能和智慧管理,城市将更加安全高效,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美好生活将有更坚实的保障。

(作者:朱波、邱玥、常河;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6月)

科技传播力激活创新生态链

全球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科技+资本+传

播”被视为三大支柱。如今,科大硅谷正以独具特色的科技传播力建设,为安徽科创注入新动能。从量子物理的科普破圈到气象科技的产业链接,一场以传播赋能创新的实践在这里展开。2022年6月13日科大硅谷启动建设,这样一方3年新增超2500家科技企业的创新之谷,正通过科技传播与产业升级的融合路径,构建区域产业能级跃升的新引擎。

科技传播:新质生产力的“倍增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大硅谷紧扣科技创新,将科技传播作为“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让硬科技“软着陆”,让“软环境”迸发硬实力,实现科技传播赋能产业升级和企业服务的乘数效应。

科大硅谷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科技传播就是专业的科技服务。”通过融媒报道、赛事活动激发、携企参展等专项举措,实现生产力的转化与提升。

“科漂”王涛是一家光电企业的负责人。早年他在长三角东部省份创业,后来他关注到家乡科大硅谷“科创生态”的相关报道,便萌生了转移至科大硅谷的想法。

“资本赋能、科技传播、企业服务”等全链条生态服务让王涛被来自家乡的“温暖”所感染,2024年王涛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将企业“军工高端替代”“民用场景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步伐向前推进,第二则是将企业研发与生产基地总部迁至合肥。科技传播成为“新质传播力”,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王涛介绍,目前,在科大硅谷的生态赋能下,这家以中波红外技术为核心的企业,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生产线”。

像王涛这样“返谷再出发”的案例在科大硅谷还有很多,他们的企业发展与科大硅谷一道成长,揭示新质生产力的深层逻辑:科技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更是以制度设计打破“知识孤岛”、以开放生态促成“创新裂变”的系统工程。

高水平赛事不仅是竞技场,更是集项目筛选、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专业化的科技传播贯穿赛事策划、执行与后续落地服务,实现“以赛促引、以赛促产”。“创业安徽大赛”正是这一模式的典范,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赛事竞争吸引全球优质项目,并配套提供强大的落地

服务。

陶冶是大模型企业行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团队便在此赛事中脱颖而出。在科大硅谷专业服务团队的精准对接与后续传播推动下,该项目不仅获得赛事荣誉,更高效完成了在安徽的落地转化。

“从内部往外看,科大硅谷是个‘大喇叭’,要去宣传推介创新创业故事,感召更多的企业和项目入谷;从外部往内看,像个‘漏斗’,要让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这里精准分类,再导入各个平台和各个产业园中去。科大硅谷从‘试验田’到‘高产田’,既要靠科技、资金,也要靠传播。”科大硅谷公司董事长吴海龙说。科大硅谷正通过科技传播赋能产业升级,塑造“科漂”品牌,聚合媒体资源扩大影响力;依托活动、赛事,孵化新质生产力;链接会展资源吸引全球项目,锻造产业向“新”力;汇聚创新要素构建“超级应用场”,推动区域产业生态协同升级。

科普破壁:让“量子纠缠”走进产业视野

“当投资人听懂量子纠缠,科学家看清市场痛点,硬科技才能真正逐浪前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主任、知名科普专家袁岚峰谈及科技传播时,一言以蔽之。

“逐浪硬科技”是科大硅谷携手袁岚峰共同打造的硬科技领域跨界对话平台,其核心定位是通过邀请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前沿科技领域专家学者跨界交流,破除科技与产业间的认知壁垒,推动前沿技术成果转化。

“逐浪硬科技”是以“打通学科边界”为刀锋的科技传播手术——它切开实验室的封闭生态,将技术的基因片段精准植入产业土壤,让创新在双向奔赴中生长。

“想象一个量子粒子如幽灵般在房间里无处不在,可当你推门观察的瞬间,它就‘坐’在某个确定的位置上。”中国科大教授彭承志在“逐浪硬科技”一次主题沙龙中,用一个生动的比喻点燃了全场氛围。台下坐着的不仅有科研人员,更有来自制造业、金融界的企业家们。

这一幕,是袁岚峰和科大硅谷精心策划的“破圈实验”。谈及硬科技的创新瓶颈,袁岚峰说:“实验室与市场之间隔着双重高墙,一面是艰深的知识壁垒,一面是资源错位的鸿沟。”

如今在科大硅谷,这类科普IP已形成矩阵效

应——系列科技传播活动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百万量级，逐浪硬科技连续获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点赞转发，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打破边际交流。

“彭教授那句‘量子幽灵’的比喻，比百页技术文档更能打动投资人。”传播的力量正让量子从实验室走入产业视野，多家金融企业已开始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设备产线。

对标“科技+资本+传播”的循环体系，科大硅谷以传播力溶解创新链断层，架起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的“超导通道”，充分发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的科研优势，联合长三角乃至全球科技创新要素，打造协同创新生态。二者相互赋能，形成“谷院耦合”联动体系——科大硅谷聚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大科学装置与企业、资本的深度协同，构建科技创新策源地与新兴产业聚集地融合发展的生态系统。

这一打法被业界称为，以平台思维和生态理念整合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既立足当下实效，更布局长远发展。

传播赋能：气象科技“链”动低空经济

科技传播的“破壁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31岁的创业者时国利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的临境气象公司在入驻科大硅谷后，通过参与“创新者说”这一特色品牌栏目，实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破。“创新者说”作为科大硅谷打造的科漂故事平台，每周邀请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创业者分享前沿技术与创新实践，其独特的模式，已促成多个跨学科合作项目的诞生。

正是通过这个平台，临境气象公司的精准气象预报技术引起了中国气象局专家的注意，为公司初创阶段起到了关键的宣传推广作用。但更令人惊喜的跨界融合还在后面——在科大硅谷组织的一次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主题沙龙上，时国利团队与合肥低空经济领域的专家产生了深度碰撞。

这种跨领域的化学反应绝非偶然。在科大硅谷的生态体系中，类似“气象+低空”的跨界融合已成为常态。物理实验室的光学技术被应用于医疗影像设备，量子计算团队的算法正在优化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

正如科大硅谷的相关负责人所言：“当代科技

创新的突破点往往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我们搭建的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让不同领域‘创新粒子’高速碰撞的对撞机。”

这种跨界联动正在产生倍增效应。临境气象为骆岗公园低空起降点提供的定制化服务，实现了3公里×3公里网格、15分钟更新的精准预报，这项技术随后被拓展应用到合肥无人机物流网络中。而气象数据与飞行数据的持续交互，又反向优化了预报模型，形成了正向循环。这种由科技传播催生的产业“超导通道”，正在让创新要素以近乎零损耗的效率流动转化，展现出科技跨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立体传播：构建科创生态“强磁场”

除了“逐浪硬科技”“创新者说”，在科大硅谷，还有“科大硅谷大讲堂”“科创地平线”“新质生产力百企谈”等IP科技传播平台。

不久前，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清华珠三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德保做客科大硅谷大讲堂，他结合深耕科技成果转化30年的一线经验，以《成果转化的角色演进与典型案例》为主题，深度解析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进阶路径，为探索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之道提供深度启示。今年以来，科大硅谷大讲堂邀请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凌文教授、松禾资本创始人厉伟、麦腾创投创始合伙人俞江虹等知名学者、投资者、企业家做客分享，聚力打造成学悟领用的实训基地，截至目前科大硅谷大讲堂已举办24期。

今年3月，星河动力航天“谷神星一号”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将云遥一号43-48星精准送入轨道。此次任务中，位于科大硅谷片区企业安徽梦克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克斯航空”）自主研发的复合材料整流罩作为火箭关键部件，首次官宣参与发射即圆满完成任务，标志着民营企业在我国航天关键部件领域实现从技术突破到工程应用的全链条跨越。

“为我司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宣传支持，极大提升了该项目的社会关注度与行业影响力。”在梦克斯对科大硅谷公司的致谢函中有这样一句话，科大硅谷通过央级、省市媒体资源帮助梦克斯在此次火箭发射的宣传链接了上下游产业资源。

在梦克斯航空的成长轨迹中，科大硅谷的创

新生态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通过精准对接科研资源,应用产业融合之道,依托第三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等展会、活动,搭建合作桥梁,促进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专项融资通道的搭建,则助力其顺利完成融资并建立银企合作。依托科大硅谷传播和精准内容策划,提升企业的行业影响力。

科大硅谷的传播力建设已形成系统化格局。文化塑造,通过系列科学家、企业家的成长故事,培育出特有的科大硅谷文化特质。专业链接,全球遴选垂直领域传播合伙人,覆盖核聚变、量子等前沿领域,机器之心、动脉网等专业媒体深度参与;国际拓展,助力斯帕斯、无论科技、中科星驰、零重力等亮相国际展会,登陆香港国际创科展,接待英国、德国、日本等地约 200 批次观众。

今年 5 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传播中心设立,由科大硅谷公司联合其他单位推进工作,共同助力安徽省科技传播迈向新台阶。“我们要让实验室的成果‘说得出’‘听得懂’‘用得上’。”科大硅谷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量子科学的形象解读到气象数据的产业转化,科大硅谷正在证明:在硬科技竞争的下半场,传播力就是创新力的“倍增器”。

科大硅谷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大硅谷作为安徽省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推动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创新,其“厚植创新生态,感召五洲英才”的发展理念正持续释放创新辐射效应。

(作者:周然、刘浩;来源:央广网,2025 年 6 月)

从“科里科气”到“新”潮涌动 ——解码安徽高质量发展背后的创新基因

利用“月壤 3D 打印系统”有望实现在月球上“盖房子”;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让核聚变发电不再遥远;自研图像生成大模型秒生逼真视频……这些听上去科技感爆棚的事,均来自安徽。

7 月盛夏,参加“活力调研中国行”主题采访

活动的记者行走在江淮大地上,处处感受到前沿科技带来的震撼以及新兴产业迸发的活力。“十四五”期间,安徽重大原创科技成果竞相涌现,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加速崛起。从“科里科气”到“新”潮涌动,安徽厚植创新基因,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未来图景照进现实

在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全球首个量子加密通话服务“量子密话”和量子办公应用“量子密信”。只需更换一张 SIM 卡并开通业务,普通手机即可实现防窃听的加密通信。“目前,量子密话密信用户接近 600 万,服务覆盖单位超 3000 家。”中电信量子集团董事长吕品介绍。

作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试点城市,“科里科气”成为合肥的鲜明标识。聚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合肥加速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端。

在合肥聚变堆园区,一个个巨大的实验室里,正在测试安装“人造太阳”的不同关键部件。作为 BEST 建设主体,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建文表示,他们正致力于将可控核聚变技术由科学实验阶段逐步提升至高成熟度的工程实践和商业应用水平。短短两年间,聚变新能已引入多方投资,注册资本增至 145 亿元。

深空探测实验室内,技术专家演示如何利用月球土壤资源就地取材“打印”出月壤砖,为国际月球科研站长期建站做准备。深空探测实验室理事会办公室主任李航表示,实验室正在积极谋划深空能源、太空旅游等十大深空产业方向。

未来照进现实的一个一个新图景,在安徽已不鲜见。

在安徽芜湖湾沚区航空小镇,12 年前的一片荒地,如今已长成一座低空经济产业之城。规划面积 56 平方公里的航空产业园内,聚集了通航整机、无人机制造、航空新材料等全产业链企业近 200 家,“不出园区即可造一架国产通航飞机”。芜湖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董亮介绍,2024 年,芜湖市低空经济产业营收达 463.8 亿元,同比增长 15.95%。

焊接、码垛、搬运……在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个个身怀绝技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上岗”前的最后测试。作为芜湖市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国家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埃夫特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核心技术研发体系，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及关键核心器件 100% 自主化和国产化。

十年磨一剑，芜湖机器人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跟跑到领跑、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发展。2024 年芜湖市机器人产业产值突破 400 亿元，聚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300 余家，2025 年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第六位。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示范应用，超前布局智能机器人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江淮大地“新”潮涌动、潜力无限。

传统产业向“新”而变

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作为农业大省，安徽通过科技赋能与产业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向“新”而变。

宿州市聚焦被誉为农业“芯片”的种业发展，积极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为支撑的现代种业体系，打造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目前已引入 10 余家科研单位与企业。

在安徽荃银兴大种业有限公司，智能化设备日夜运转，新繁育的小麦种子高效入库。公司入驻科技谷后，组建硕士研究生科研团队，在宿州市建成 1200 亩科研育种基地。

成立于 2024 年的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生物育种中心致力于大豆生物育种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中心已开展多项针对适合宿州本地种植的大豆品种选育工作，已有 5 万余份大豆材料在宿州种植，从中筛选出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系 32 个，这些新品系蛋白质含量较常规大豆提升 9% 以上、单产提升 10% 以上。”中心负责人段凯旋说。

在芜湖市繁昌区，溜溜果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青梅深加工打开产业新局，一年卖出超 20 亿颗青梅。从“电解质冰沙梅冻”到“黑咖西梅”，不断“上新”的产品受到年轻消费者欢迎。为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引入 AI 分拣去核设备，开展包装材料、无菌灌装、锁鲜技术等多项研发创新，打造

“从一颗青梅到一整套健康食品”的全链条体系。

作为中国铜工业重镇，因铜而名的铜陵，2024 年铜基新材料产业产值超 700 亿元。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漆包扁线车间内，一排排自动化的流水线上，滚轮飞转，一根根铜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作为国内特种电磁线行业的龙头企业，该公司生产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国际市场，覆盖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机器人、无人机、核聚变、磁悬浮交通等领域。

向新而变，向绿而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内，通过浸出、熔炼、电解等技术加持，一块块铜矿石被“吃干榨净”，变“废”为宝。

建设绿色智能铜基新材料项目、打造高精尖深加工铜产业链、巩固拓展高端铜基新材料领域先发优势……一根根铜线，连接起一座资源型城市全产业链的升级跃迁。

科技与市场相见相融

从大科学装置的尖端探索，到企业车间的技术攻坚，江淮大地上创新活力奔涌。创新从何而来，去往何处？

——聚焦科技优势，打造创新基础。安徽聚焦“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领域，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前沿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在基础设施层面，安徽加快大科学装置集聚布局，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平台。目前，该省已建、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 13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 23 家。安徽不断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提升创新动力。在安徽，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和源头活水。一批本土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位于合肥的科大讯飞，2024 年研发投入达到 45.9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近 20%。“讯飞星火”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政务等场景。在芜湖，海螺、奇瑞等行业巨头带动创新资源集聚。2024 年，该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4.2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

——打通创新链条,推动成果转化。从“书架”到“货架”,安徽在政策、资金、应用场景等前后端持续发力,加快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政策资金端,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基金丛林”,构建起“政府领投、国资联投、机构跟投”的多层次基金体系;场景应用端,加快打造科技成果首次应用场景。

2025年,安徽出台《安徽省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行动方案》,“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力,全面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

围绕产业链推动创新链发展,围绕创新链优化产业链布局,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市场相见又相融,这或许是安徽给出的答案和启示。

(作者:班娟娟、郭晨、陈尚营、黄博涵;来源:《经济参考报》2025年7月)

新动能集聚 新业态涌现

新产业壮大

——京粤皖三省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中,记者先后走进北京、广东、安徽三省市,实地探访产业创新:

平均每3天,这里生产一颗中型商业卫星——银河航天(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浩瀚宇宙中“添星”“织网”,构建起我国首个低轨宽带通信试验星座。目前,北京市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已突破2600亿元。

平均每30分钟,这里制造一台工业机器人——广东佛山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是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园区之一。去年,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产量超24万台(套),同比增长31.2%,占全国市场总量的44%。

平均每30秒,这里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安徽合肥今年1至5月生产新能源汽车46.7万辆,较两年前同期翻一番。安徽省汽车出口量居全国前列,我国每出口4辆汽车就有1辆“安徽造”。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北京、广东、安徽等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断促进新动能集聚、新业态涌现、新产业壮大。

锚定科技创新,未来产业引领产业未来

“起飞!”一秒钟原地升空,最高时速达100公里,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研发的单人喷气飞行背包,于今年初首次实现载人样机多科目自由飞。“未来,不仅能把穿戴者送上天,还能进行高空悬停作业。”飞行器总体设计师陈旭智介绍,这款飞行背包适用于特种作业、应急救援、短程通勤等多元场景,科幻画面正在成为现实。

培育未来产业,既要对未来有信心,也要对当下有耐心。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孵化风险高,低空经济如何振翅“高飞”?有赖于耐心资本的助力与呵护。去年6月,广州市政府组建总规模100亿元的广州天使母基金,相继与包括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在内的62家单位建立合作,提供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迄今已完成7只参股子基金设立,储备直投项目超1100个。

在合肥,走进国家航天局、安徽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方共建的深空探测实验室,3D打印设备生产的月壤砖引人注目。设备能以1300摄氏度高温熔化月壤,无需从地球携带辅料。“用月球的土,烧月球的砖,建月球的家。”深空探测实验室未来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洪伦介绍,这款3D打印设备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

发展未来产业,既要夯实基础研究硬支撑,也要优化产业生态软环境。近年来,安徽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2024年,安徽布局筹建首批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涉及量子科技、空天信息、通用智能等领域。今年一季度,安徽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集聚产业链重点企业超100家,产业规模超196亿元。

今年4月,来自北京经开区的天工Ultra机器人走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用时2小时40分42秒,跑完约21.1公里,途经14个90度以

上弯道,穿越碎石子障碍带,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桂冠。获得亚军的松延动力N2机器人同样“身怀绝技”,能连续后空翻,目前销售订单逾2000台,合同金额上亿元。

壮大未来产业,既是一场时不我待的“竞速跑”,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既要快人一步、抢占先机,也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介绍,北京市已聚集机器人骨干企业400余家,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机器人企业57家,居全国首位。2024年,北京机器人产业营收超过300亿元,同比增长近50%。

“今天的未来产业,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决胜竞争的支柱产业。”北京市市长殷勇介绍,北京前瞻布局了通用人工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元宇宙等23个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其中人工智能企业突破2400家,核心产业规模近3500亿元,均占全国一半以上。

撬动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促兴

一架无人直升机,性能有多强?翻山越岭,最高可飞抵海拔6500米;逆风作业,最大可抵御8级阵风;负重高飞,最多可运输200公斤货物……深圳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TD550D无人飞机,今年3月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无人直升机系统型号合格证。“成立11年来,集团申请专利超600项。”联合飞机集团深圳基地总经理李晓亮介绍,企业先后为神舟十三号、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提供无人机保障。

下好产业发展“先手棋”,首要靠创新。中国无人机专利申请量占全球七成以上,其中广东无人机专利申请量逾2.6万项,居全国第一。目前,广东低空经济规模超千亿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95%,工业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54%。广东累计开通无人机航线超700条,无人机物流配送年飞行近80万架次。

一片卫星太阳翼,厚度能多薄?约1毫米!银河航天(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灵犀03卫星太阳板薄如蝉翼,折叠后仅5厘米,抵达距离地面50万米的轨道时,则能延展成长9米、宽2.5米的金色“翅膀”。“这款卫星使用柔性太阳翼,厚度降至刚性太阳翼的1/20,同等荷载下的面积更

大。”银河航天创始人徐鸣介绍,柔性太阳翼能吸收更多光能,当前卫星正以每秒约7公里的速度绕地飞行。

扭住产业发展“牛鼻子”,关键在质优。北京聚集商业航天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300家,形成运载火箭、卫星制造等全产业链。众人拾柴火焰高,要素资源高效流转,银河航天供应链合作企业数量从2018年创立之初的117家增至如今的1300多家,其中超过一半是民营企业,单颗卫星研制成本从上亿元降至千万元量级,研制周期缩短80%。

一台工业机器人,精度有多高?0.2毫米!在安徽江淮汽车集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合肥尊界超级工厂,超过1800台智能机器人同步作业,实现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全面自动化与数字化,借助华为自研算法,能对全工艺流程2.6万处关键质量数据进行分析与追溯,每秒数据采集量达30万条。

打好产业发展“组合拳”,重在协同发力。2023年底,江淮汽车集团携手华为,投资约100亿元打造合肥尊界超级工厂,年产能达20万辆。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换电”试点、“双智”试点、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的“四试点”城市,合肥2024年生产新能源汽车137.6万辆,同比增长84.4%。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介绍,“十四五”以来,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6.1%,去年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43.6%,较2013年的20.7%翻一番。

推进发展方式创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焕发新机

无需司机驾驶,方向盘自动旋转,北汽福田氢能源L4级自动驾驶重卡畅行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刹车、油门由电子信号控制,决策响应速度在0.5秒以内,非紧急情况下,安全员可全程不接管车辆。始建于1958年的北汽集团,曾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多项纪录,去年整车销量逾171万辆,营业收入超4800亿元。今年1月,北汽集团宣布

将在所有车型上布局自动驾驶技术，成为北京市传统汽车产业转型的一道缩影。

技术演进与商业推广相互促进，助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跃升。2020年，全球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落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市已实现600平方公里设施智能化部署。“车在跑、路在看、云在算。”北汽福田智能驾驶总工程师田俊涛说，企业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卡车相继投入商业运营。目前，北京自动驾驶累计测试里程突破6200万公里。

铜水奔涌，气浪扑面，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车间内的工人并不多，奥秘何在？800余台5G终端设备遍布各个生产环节，这座铜冶炼工厂，去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4年5G工厂名录》。传统作业方式下，工人在60多摄氏度的电解槽旁工作时大汗淋漓。如今，机械手臂、智能运输小车和数字孪生系统应用后，企业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率达90%。

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双向发力，助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迈进。近年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建成智慧矿山、智能工厂等93个智能化项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安徽省2.46万家规上企业已全部启动数字化改造，其中1.88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占全部规上企业的76.25%。

全球每3台液晶电视中，就有1台使用广州视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主控板卡。“‘广东屏’能刷屏世界，关键在于做好一块屏里的创新文章，企业液晶电视主控板卡出货量逾7.7亿片。”视源电子首席技术官杨铭介绍，企业旗下品牌青松光电2023年发布LED“碳”索计划，经评估，全系列产品一年可节电1273万千瓦时，相当于种下13022公顷阔叶林。

节能降耗与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截至今年初，广东累计创建国家绿色工厂490家、绿色工业园区13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04家。擦亮绿色发展底色，广东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2.8%。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以年均3.5%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3%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1.8%。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一手抓传

统产业改造，一手抓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育成。”广东省省长王伟中说，广东将继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作者：戴林峰、王昊男、韩鑫、屈信明、孔德晨、陈静文、潘俊强、李纵、李俊杰；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7月）

安徽合肥：“量子大道”越走越宽

一台普通的智能手机，经过软件定制，插上量子SIM卡，便可以进行无法被窃听的量子加密通话。7月2日，科技日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主题采访活动来到位于合肥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量子集团”）。展厅里，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公司的量子加密通话技术。该技术将量子加密技术与即时通信技术融合，由此打造的量子密信密话产品目前已获近600万用户青睐。

合肥是我国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集聚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企业。围绕培育壮大量子产业，合肥正全面发力，将前沿科技转变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澎湃动力。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未来产业高度依赖前沿技术，量子产业能够在合肥落地扎根，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

“合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全国乃至全球量子科技研发最为领先的城市之一。”中电信量子集团董事长吕品说，企业选择落地合肥正是看中这里的创新实力，希望能和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起，共建量子科技产业生态。

但领先的技术并不一定能顺利转化为成熟的产业。技术要形成产品，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离不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科技局成立了服务量子产业的专班，集中办公，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制定量子产业发展的

各项政策,覆盖产学研用各个环节。”合肥市科技局副局长吕波向记者介绍,为了鼓励量子科技产学研深度融合,合肥实施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鼓励企业“发榜”,科研团队“揭榜”,单个项目最高可支持 1000 万元,帮助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2021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徐飞虎等首次实现超过 200 公里的远距离单光子三维成像,成像距离从十公里突破到百公里量级。依托该技术,中电信量子集团参与投资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远距离单光子成像雷达系统、小型化远距离单光子成像雷达系统等产品已经上市应用。“我们和各大科研单位都有深度合作,带着问题、以产业化的视角参与源头创新。”吕品明显感觉到科研成果转化时间大大缩短,“按照老路子可能要 10 多年才能落地的成果,现在 3—5 年就成了!”

从资金支持到场景牵引

“产品是种子,种子种下去以后能不能长大,成为商品,进而培育形成产业,还要靠肥沃的土壤和各方面的精心呵护。”吕波告诉记者,以量子产业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需求,需要各方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才能发展壮大。

初创阶段,企业发展最需要的是资金。量子产业前期投入大,营收少,更需要耐心资本的长期支持。

么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分布式离子阱量子计算研究的企业。公司成立时,需要启动资金 3000 万元,而创业团队自有资金不到 200 万元。关键时刻,合肥市及高新区的相关投资机构相继向其投资 3000 万元,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公司成立一年后,便完成了高通光离子阱量子计算工程机的研制,具备了整机交付能力,在新的技术路线上实现突破。

除了资金支持,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应用场景支撑同样关键。

2023 年,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220 千伏合肥候店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正式建成投用。这是国内首座应用覆盖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三大方向的在运变电站,实现了量子技术在电力行业产业化应用的重大突破。

“量子技术其实并不神秘,我们努力推动各个行业踊跃尝试。只有先用起来,产品才能够快速迭代,产业才能壮大成长。”吕波介绍,合肥市科技局“三新”(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认定、工信局“三首”(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都对量子产业等给予一定支持,推动相关产品落地应用。

如今,仅在合肥市高新区的云飞路上便集聚了 30 余家量子科技龙头企业,这条路因此又被称“量子大道”。而在合肥全市,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有近 90 家,居全国首位。围绕量子产业,合肥已初步构建了从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到工程化、产业化的完整生态链。

(作者:都芄、张晶;来源:《科技日报》2025 年 7 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久者親其苦
遠方慕其德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石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